一五一十周刊

NO. 133
2013年 11月29日

丽江
豆瓣douban
欧洲
搭车
文艺炮
西藏
穷游
扫货

不去旅行会死吗？

月末版“时间与空间”第三期



编者的话

松尾芭蕉有首著名的俳句“心随风舞，葬身荒野亦无悔”，这位俳句之神在首次长途旅行后的感慨之词，现在常常被苦旅中的人拿来自勉：能让心跟着风飞扬，这样就算在旅途中曝尸荒野，也无怨无悔。

类似这样旅行的妙处从来都受人推崇：旅行能平衡生活的琐碎，让人从繁杂中抬头，享受更自由的呼吸；旅途的见闻能让人开拓眼界，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旅人的思考让人生更充盈、完整，连剧作家哥尔多尼也要说“绝不离开自己祖国的人充满了偏见”。然而，从什么时候起，旅行好像不止这样而已。

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景点周围卖着几乎同样的景区产品；有没有突然意识到朋友间聊到旅行，言必称西藏、尼泊尔，好像不去一次人生就此残缺了；有没有慢慢厌倦又是谁谁欧洲 n 国扫货归来，兴奋地摆拍；有没有开始悄悄屏蔽朋友圈里使劲晒各地旅行照片的好友；有没有发现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之后，并不见得消除了多少偏见?

那些让松尾芭蕉“葬身荒野”也不悔的旅行，去哪儿了呢?

本期一五一十周刊月末版，让我们抛掉“不去旅行会死”的浪漫情结，结结实实来看一看我们的旅行到底正在发生些什么，让人们心驰神往的完美旅行都被什么给毁掉了；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让人受益的旅行，我们为了什么而出发?

帕斯卡尔在《沉思录》中说：“人类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呆在他的房间里。”也许，我们根本不用走出房间，不用横尸荒野就可以来一场“心随风起”的旅行，方法在本期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就能找到咯。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周刊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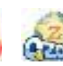


将本刊分享至：








┣引子┫

荐书：《旅人》

胡晴舫：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戏剧硕士



介绍：胡晴舫的《旅人》，讲的是关于旅行以及旅行的人，更是关于旅行者流离的眼睛所看见的别人与自己。作者用旅人难得的冷静、客观，审视在旅行中的人和事，虽是游记却有着“反游记”的自持，一路反思旅行的文化意义，以及之于人生真正的内涵。胡晴舫在书中说：“旅人带着他的偏见赶路，有些旧偏见被印证，成为真理；有些被修正，形成新的偏见。经由旅人的闯入，则影响了没有离家的人们看待世界的态度——或，另一面的偏见。”通过这本书，读者也许跟真实的旅行离的更近些。

作者：胡晴舫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年：2009-1

页数：181

【回到目录】



┣去旅行有什么了不起？┫

“

就算去到世界的另一端，旅人终究还是会返回来。不然，就没有‘人’会知道他的勇敢、他的发现和他的睿智了。---《旅人》

”

马兜铃：为什么这么多人认为到西藏旅游就能找到人生真谛？

马兜铃：知乎网作者

“

标榜旅行经历炫耀所见所闻的人多之又多，而真正因为旅行而获得真谛，改变人生的人少之又少。

”

因为他们走过的地方还不够多。他们所谓的真谛是如此的肤浅。

在这个信仰缺失的国度和信仰缺失的时代，一些人高喊着辞职去 XX，去 XX 流浪，心灵的旅行之类的总总话语。奔赴某地，看到了一些日常生活中不曾见识的人文抑或自然景观，自以为心受洗礼，旅行结束回到家中，却与俗人无异。

标榜旅行经历炫耀所见所闻的人多之又多，而真正因为旅行而获得真谛，改变人生的人少之又少。我也曾入藏，所见所闻虽然震撼，可是说到真谛，可真是无法总结无法表达。
回到丽江后接待沙发客，数来也有百十来个，有揣着复古交卷相机的豆瓣女青年，有日行 80 公里胡子拉碴的徒步者，有骑摩托环游中国的大龄未婚女青年，有浮夸牛逼旅途的背包客。

在众多人之中，只有一个女孩真正打动过我。



皮肤黝黑，穿着拖鞋，一个学生式的书包，没有任何户外设备和相机。

签证到期，她从印度回国，重游云南，除非我问到，她从不主动谈自己那些旅行的故事。

她在国内旅游三年，在国外七年，经费靠打工和家中支持。有一个瑞士的男友。

她不写游记，不拍照片，上上网只查查基础的信息。

她坐在我身旁，我完全能感受到内心的平和和宁静。

深夜，我和她坐在古城的院子里喝酒。

我问她，你去过这么多地方，哪里让你感觉最好？

她说，哪都好呀。

我问她，你会一直这样玩下去么？

她说，再看吧。

我问她，你出来这么久，走过这么地方，有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悟。

她说，哪有那么多感悟，我只是想多走走看看，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

就是这样平和的对话，她是我至今最欣赏的旅者。

哪有那么多真谛。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心中安定的人，走到哪里都是春天。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郑同辉：同学，别再跟我说你要去旅行了

“

不能将旅行看的过于神圣，他不是悬壶济世的良药，解决不了你的任何问题。在出发之前你就要想好回头的路，你不是一条船，随波逐流你做不来的。也不要说旅行的最后是回归生活，他本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要活生生的把他拆开了，走两种极端。

”



郑同辉：大连外国语大学学生，热爱旅行，励志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我暂停旅行的投名状。十一骑行了五百多公里，一路上看了很多听了很多想了很多，回来之后揉搓了一个礼拜，没学习，写出几篇东西来，给自己看看，给大家看看。这是第一篇，或许会被人骂死，或许也有人表扬，我不在乎，只是想表明自己的一个态度，一个在信仰缺失的时代如何保持自己应该有的梦想的态度，如何在上帝已死的巨大命题下遇见未知的自己的态度。我们需要通过自己内心的修行来历练，来成长。辛涅科尔说过：对于宇宙来说我微不足道，但对于自己来说，我就是整个宇宙。所以，修持本心，保持本我的清明，尽量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中沉下来。就够了。

【正文】

生活在这个时代，你要是说你不梦想着旅行都不好意思出去跟人打招呼....

那么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空虚到竟然把旅行当做了梦想？

打开人人，满屏都是几个字：我要旅行！赤裸裸明晃晃，刺的我眼睛睁不开的疼。

不可否认，旅行的确很被向往，它对一个人意义无穷。想起被无数人奉为旅行至理名言的几句励志语，摘抄如下，与君共勉：



1 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会以为，这就是世界。

2 有些事你现在不做，就永远不会去做了。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你遇到多少人，见到多少未知的风景，而是在某个瞬间突然认识了自己……

4 一个人的一生，一定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5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一定要有一个在路上。

我当然不会蠢到去觉得这些话有什么问题。励志嘛，在这个年头，又不是多值钱的事情。芙蓉姐姐摇身一变，给大家励了志；林丹拿了个大满贯，大家觉得很亢奋；莫言静悄悄，也终于圆了中国人一个情结.....

更何况旅行呢？

于是，所谓的旅行，被很多人“实现”，拿起单反背包和一个说走就走的假期，带着父母的工资，开始了自己的所谓的修行。

再于是，我们看到了祖国大江南北客房爆满；我们看到长城上面“用我们的血肉筑成一座新的长城”；我们看到华山黄山庐山游客上的去下不来.....

呵呵！身体不好的，早都挂了，果然是修行。

记得高中时老伏曾经讲过：旅游业的兴起是因为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不满足于当下所处的环境，有了一种外出探寻的渴望，随后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产业。由此，我是不是可以说：旅游这种行为的产生，就是因为人们钱太多烧的？

请注意，我在这里说的是旅游而不是旅行。你如果非要较真说你想要的是旅行而不是旅游，那么我只好请你接着往下看了。

很多人几乎都为自己的行走足迹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相册，不管是隐秘的还是公开的；这些人中，几乎每一个人的相册里面都有几张关于美食的；同理，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在某个著名景点之前的合照，然后摆个喜气洋洋的 POSE，向世人宣布：哥来过！

我当然不会去拿这些个意境跟悟空当年撒泡尿写上“到此一游”去做对比，因为悟空兄是为了跑出去看看这个世界才撒尿的，而我们，是为了撒泡尿才跑出去的，没法比较。（请原谅我的粗俗，但是真心觉得只能这么比较了）



再于是，每逢节假日，我就很有兴趣地打开人人，看着人们用相同的套路喷射出不同颜色不同温度不同时差不同海拔的液体，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曾经来过这里。可是，大家忘了一点，存在感是一种很有对比度的东西，证明自己存在的方式不是像动物园中小猴子引起老猴子的注意才是存在，猴子需要的是引起饲养员的注意，这才叫存在。

兴尽所至，给大家举个我知道的很多人出去旅游的步骤：

1 首先打电话给家人。妈，假期了，我要粗去玩嘛，blablabla，通过各种能让灵魂在路上的语录顺利拿到钱。

2 订飞机票，最差也是火车票。

3 网上找攻略，找美食

4 机场候机，顺便嘟着嘴拍张照片上传：哎呀，等飞机什么的最无聊了，XX 之行，我好期待哦。

5 下飞机，找人接机，拍张照片：哎呀，XX 来接我了，好开心。

6 直奔宾馆，拍张照片上传：这个宾馆没有空调唉，讨厌死了，不过，为了美食，就凑合一下吧。

7.吃饭前把食物拍下来上传。

8。第二天直奔所谓的著名景点去，拍张照片上传，顺便抱怨下人很多天很热，大姨妈错乱心情很烦躁云云

9 收拾收拾行李，抱怨下假期不够用啊，没玩够啊，blablabla。

10 回家回学校，整理照片，上传。

不知道这些步骤有没有引起大家共鸣，反正我想说的是这绝对不是个人杜撰，而是当今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理解的所谓旅行的价值观。我个人的理解就是：通过没本事的手段来一段没本事的坐飞机行程，来证明自己已经有足够的本事花着父母的钱酣畅挥洒青春，实现自己自私的梦想了。

很多人都希图在旅行中寻求到意义，而就像周国平先生说的：“一切的意义都寓于过程。然而，现代文明是急功近利的文明，只求结果，藐视过程。”（《守望的距离》）大家扪心自问，你因为旅行，获得了什么？真正获得了什么？



我觉得很少有人能真正回答出这个问题来，每个人都陷入了一个怪圈，平时忙着攒钱，攒够了钱就去旅行，然后在嘈杂声中，在拥挤的人群中花完了时间和金钱，回到自己无比鄙视的工作岗位上继续攒钱，以便开始下一次的“旅行”....

不，这不是旅行。 我们不远万里去了一座城市，却只是拍了几张照片回来，没有用心去感受那座城市所带给我们的氛围，用心去聆听这个城市的声音...虽然中国的城市每座基本都相同，但每个城市所包含的自己独有的精神和沉淀是不同的。《迟到的间隔年》里有这么一句话：”一个人不可怕，怕的是迷失。孤单可以习惯，空虚不能习惯，可以两手空空回家，但不能带着空虚的灵魂。”现在我貌似能理解这空虚的含义了，当你背着沉甸甸的背包准备出游时，或许你的内心依然空虚。当你踏出脚步的那一刻，你只填补了心里的一半，而另一半需要你自己来填补，那就是释放心中的所有情绪，带着一颗你真正想去做事的心，然后努力去做。

我特别佩服的一位行者跟我说：金钱决定旅行的长度，眼界决定旅行的宽度，心灵决定旅行的深度。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写道：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旅行，能让你遇到那个更好的自己。我认为，有深度，才是真正的旅行。

我一直不能理解一个现象，大外有座后山，绿化不错，景色也不错，登上山顶，可以远眺大海，俯瞰大外，景色真的很好，但是周围那些叫嚣着要去环游世界的孩子们，竟然连一百米之隔的地方都没去过！

可笑？可怜！

还有人找借口说旅行没时间没钱。其实又是那句老掉牙的话：真正的旅行，或许真的是带着一颗心上路，不必在乎目的地，不必在乎有没同伴，不必在乎有没有相机，或许还可以不必在乎有足够的钱，只要你的一颗心，只要你去做，你敢做，你绝对可以领略到世界上最好的风景，最最让自己刻苦铭心的经历。

同学，别再好高骛远了，别再等待假期了，别再跟我说，你要去旅行了。我真的不明白，一个连自己身边美都发现不了的人，通过旅行，能收获什么？

同学，你为什么要把距离跟旅行对立起来？为什么要把时间跟旅行对立起来？为什么要把金钱跟旅行对立起来？

同学，别再跟我说你要去旅行了，你不一定要找个大海春暖花开。不一定要找个农场喂马劈柴。在平时，如果你吃一个玉米猪肉馄饨都很开心，能够领略它的味道，那馄饨就是你



的另一个世界。在周末，如果你和朋友一起能放松自己，感受另一种不同生活，那你大概已经周游宇宙，不必依凭什么了。

旅行，从来不是梦想，只有你空虚如游魂，才会拿它做标榜。

同学，别再跟我说你要去旅行了，一个人心有多大，他就能走多远，如果你自己都走不出你的心，坐上飞机又能飞多远呢？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什么毁掉了你的旅行？┫

“

旅人的眼睛是一天、两天或二十天就会结束的状态，当地人的生活却是一辈子的事情。他们不应该为了陌生人好奇窥探的私欲而活，他们应该为自己和其子孙而活。他们应该根据他们的需求来打造拼装他们的城市，而不是为了旅人的眼睛勉强筑出不适合生活的空间，只为了摆姿态表演。---《旅人》

”

欧逸文：“中国特色”的欧洲十日游：一天 1500 元的欧洲之旅

“

到了旅途的第四天，我们不再对早上坐三个小时，下午再坐三个小时的大巴，而只有中间安排了游览的短途旅行有任何异议。当我们停下来补充能量和上厕所的时候，我们只和旅行团的驴友们说话。我们就像一艘移动的且自给自足的豪华旅游客船。从地图上看，我们的路线宛如北斗七星一般，从德国出发，绕过卢森堡后进入巴黎，在法国南部绕了一个大圈之后，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到意大利，然后延伸至

欧逸文：《纽约客》驻北京记者



罗马。

”

几千年来，中国的老百姓一直被劝诫不要远离“中央之国”去海外冒险，而在最近的新年假期(兔年春节为 2 月 3 日)来临之前，当地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全是出国游的广告，看起来好像每个中国人都有出国旅行的打算。于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出国旅游一把。根据中国旅游行业对公众海外旅行目的地选择的调查结果显示，欧洲是首选去处。中国的旅行社通常是按照客户的喜好而非西方的传统概念来安排欧洲游（注：grand tour，指从前英国贵族子女的遍游欧洲大陆的教育旅行，本文泛指“欧洲游”）的具体路线，这种策略同时也是他们的竞争手段之一。我在网上简单地浏览了几则出国旅行的广告：“大广场，大风车，大峡谷”（注：为一个叫中英旅行社的广告）是一条四日巴士游的路线，主要是观赏荷兰和卢森堡的风光秀丽的乡村景象；“追今抚昔，东欧之旅”则是以冷战作为卖点，不过二月份去东欧，我看还是算了吧。

最终，我选择了“经典欧洲行”，这是一条颇受欢迎的巴士旅行路线，十天之内将穿越五个国家。需要预付款。机票、食宿、保险和其他费用总和约为 2200 美元（合人民币 14500 元）。此外，为了防止有人在旅途中脱团，旅行团里的每个中国人还需要再缴纳 7600 美元的押金（这比中国普通工人两年的薪水还多）。我是第三十八个报名的，也是团队里的最后一名成员。出发时间预定为我报名后第二天的清晨。

我按照预定时间赶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的 25 号门，一位四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已在那等着我们，他穿着灰色斜纹软尼外套，戴方框眼镜，梳着蓬松的分头，他自我介绍叫李兴顺，是我们的导游。为了把我们这些团员与其他人区分开来，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块淡黄色的领章，上面印着一条鼻吐云雾足踏登山靴的卡通龙像，下面还刻着一句铭词：龙腾万里。

我们被安顿到国航直飞法兰克福航班的经济舱里。坐定之后，我随手打开一本名为“团体出境旅行须知”的中文小册子，这是旅行团强烈建议团员们仔细阅读的指南。这本手册值得玩味之处在于会让人想起以往出国旅行的那些不快而意外的经历：“切勿随身携带仿冒的欧洲商品，海关检查员会予以没收，并对你进行处罚；”此外，它还着重提及了如何保证欧洲之行的安全性：“看到吉普赛人在路边乞讨时，千万不要给他们钱。如果他们围拢过来要求你出示钱包时，马上大声呼唤导游；“手册要求旅行者尽量避免和陌生人交谈：“当有人要求你帮他拍照时，你需要提高警惕，因为这是窃贼行窃的黄金机会。”我以前



曾在欧洲待过几年，但这本手册却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欧洲，不过，此行有三十多名团队成员再加上一名导游做伴，我想自己也没什么好不安的。手册最后以一句论语式的建议将我们这趟欧洲之旅概括为一次品质考验，正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我们在浓雾中降落到法兰克福机场，下飞机之后，全团人在机场进行了首次集合。团队成员年龄层次各异，年龄最小的是六岁的吕克仪（音译），他 70 岁的外公刘功盛（音译）年纪最大，刘功盛是一位已经退休的采矿工程师，陪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刘的妻子黄雪晴（音译），她腿脚不便，坐在轮椅上。差不多团里的所有人都是来自于总人数约为 1.5 亿到 2 亿人的中国中产阶层，其具体的职业分布为：一位高中理科老师，一位室内设计师，一位房地产商，一位电视台布景师和一群叽叽喳喳的学生。我的这些同伴都是对农村没有任何概念的城里人，以致于第二天在法国一处牧场看到一匹吃草的马他们都觉得很稀罕，纷纷拿出照相机拍照。实际上，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了解才刚刚起步。除了极少数例外，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到亚洲以外的地区旅行。

因为我是团队中唯一的非中国人士，因此李导游着重介绍了我，每个人都向我致以了热烈欢迎。今年刚满十岁的刘一峰剃着个西瓜头，穿着一件点缀着白色五角星的黑色运动衫，他微笑着问我："是不是所有外国人都长着你那么大的鼻子啊？"我们登上了一辆金色的长途汽车，就此启程。我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了下来，一个看起来挺壮的 18 岁小伙坐到了我身边，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宽大汗衫，戴着细框眼镜，一头黑发，留着长长的刘海，上唇刚刚冒出点胡子茬。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名叫许诺，这个名字在中文里有"承诺（promise）"的意思，于是他就把 Promise 当成了自己的英文名。许诺是上海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的大一新生，在学校里住四人一间的宿舍。和他同行的父母坐在过道对面的位置。当我问他为什么一家人放假不去走亲访友，非要选择出远门旅行时，许诺告诉我说："走亲戚是传统习俗，但现在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富裕了，再说，其他时间大家又太忙，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旅游。"虽然我们是用中文交谈的，但每次小伙子表示惊讶时，嘴里都会冒出一句"Oh，my Lady Gaga!"，这种时髦的英文表达方式是他在学校里刚学会的。

李导游站在大巴车的前排，面朝我们，手里还拿着一个麦克风，以后在我们白天大部分的清醒时间里，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对于中国游客而言，导游的作用非常重要，他们集翻译、插科打诨和团队指挥多重角色于一身。在周围人看来，李导游绝对是个遇事淡定行事老练的人。李导游经常用第三人称的"李导"来指代自己，效率高是他引以为傲的一大职业素养。"大家对下表，"他说，"现在是晚上 7 点 16 分。"对完表后他恳请我们每次出发前最好提前五分钟。"大老远的飞到这里，多不容易啊，"他说，"大家可要好好把握这次机会。李导的计划是这样的：由于在车上待的时间比较长，他会趁这段时间给我



们讲讲欧洲的风土人情，以免在观景时浪费太多时间而耽误了拍照。他还告诉我们，法国科学家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导游讲解的最佳时长为七十五分钟。“在知道这个科学结论以前，最长的一次我曾在大巴车上接连讲了四个小时，”他补充说。

李导建议我们在上床睡觉前先用热水泡泡脚，以尽快把时差倒过来，要多吃水果，这样有助于克服欧式饮食中面包和奶酪带来的不适感。现在是中国的新年假期，这里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中国游客，大家要小心些，不要在停车点上错了车。他又向我们介绍了司机彼得·彼查（Petr Pícha），彼查是个冷漠的捷克人，之前当过卡车司机和曲棍球运动员。听到导游在介绍自己，他从驾驶位上向我们有气无力地挥了挥手。（“之前我给日本团开了六七年的车，”后来他告诉我说，“现在来的都是中国人。”）关于日程安排，李导又讲了一些其他注意事项：“在中国，我们都把巴士司机当成能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超人，随叫随到。但这里是欧洲，除非遇上恶劣天气或交通问题，否则只允许司机开十二小时！”

他解释说，每位司机都有一张卡，必须把它插在仪表板的插槽中。如果司机开车时间过久，就可能会受到处罚。李导说：“我们可能会觉得，你只要做一张假卡或改一下记录就行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如果你被抓住，最低罚款是 8800 欧元，而且他们会没收你的驾照！在欧洲就是这样。从表面上看，好像靠的是每个人自觉，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着严格的法律。”

我们就快到达酒店（位于卢森堡的一家贝斯特韦斯特旅馆）时，李导先向我们介绍了一下今后的早餐。一顿典型的中式早餐包括一大碗米粥，一份油条，或许还有一屉猪肉包子。然而他委婉地告诫我们：“在欧洲的整个行程中，我们的早餐基本就是面包、冷火腿、牛奶和咖啡。”这让旅行车里出现了片刻沉默。

我们根本没见到卢森堡在白天是什么样。天刚亮我们就离开酒店，很快回到了高速公路上。李导要我们确认一下，千万别落下什么东西。以前他的一些年纪较大的游客，有把现金藏在厕所水箱或通风口里的习惯。他说：“最夸张的一次，我有一位游客把钱给缝进窗帘下摆里了。”我们此行的第一站是德国小城特里尔市。虽然对于初次到欧洲的大多数游客来说，特里尔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自从几十年前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来此参观之后，这里便是中国游客常来的一处地方了。这是因为他们想看看卡尔·马克思的出生地。我手里那份由一名退休外交官写的中文导游手册中说，这里曾被描述为中国人民的麦加圣地。

我们下车的地方是一条整洁的小街，屋顶高耸、色调柔和的建筑沿街排布。雨后的鹅卵石路闪着银光。李导戴上青绿色的宽檐毡帽，步履轻快地在我们前面引路。我们到达了布吕肯街 10 号。那是一幢漂亮的白色三层楼房，镶有绿色的百叶窗。“马克思当年就曾在这



里生活过，它现在是一个博物馆。”李导说道。我们试着推门，但它上着锁。冬天是旅游淡季，博物馆还要再过一个半小时才会开门，所以我们只能从外面感受一下马克思的房子。（李导说：“我们越早看完，就能越早到达巴黎。”）在大门旁边有一块牌匾，上面是马克思的侧面头像。隔壁是一家名为“甜蜜生活”的快餐店。

李导说我们想逗留多久都可以。但他也建议大家到街拐角处的超市里停一下，买些水果，预备今后几天在路上吃。我们有些尴尬地在马克思的家门前转来转去，一边拍照一边躲着汽车。最后团里的一个小孩不耐烦了：“我想去超市。”并拉着他妈妈向明亮的店面走去。站在我身边的，是一位名叫王振宇的五十多岁高个子男人。我们看着马克思的头像。“在美国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吧？”他问我。

“很可能会比你想像的人数要多，”我回答道，并补充说，我以为在这会看到更多中国游客。王笑了起来，说道：“年轻人不再了解那一切了。”王振宇身材较瘦，棱角分明，带着白手起家的那种气质。他从小生活在东部的商业城市无锡，以前被分配去当木匠。在中国开始搞经济改革后，他便下了海。现在他经营着一家小型服装厂，专门生产免烫男裤。他不会说英语，但他想要为自己的公司起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化的名字。所以他把它命名为“格瑞特”，这是一个用汉字自创出来的词，因为他觉得这个词听起来最接近英文单词“Great（伟大的）”。

王振宇是一个热衷于旅游的人。他说：“我过去太忙了，但现在我想旅游。以前我总是在买地、建厂、装修房子。现在我女儿长大参加工作了。我只需要给她攒够嫁妆就行了，这没什么问题。”我问他为什么和妻子选择了来欧洲。“我们的考虑是，趁着我们仍然有精力，先到最远的地方去。”他说。王和我是最后到超市去的人。我们这个团在中国的“麦加”呆了十一分钟。

直到近些年之前，中国人有充足的理由无法享受旅游之乐。旅行在古代中国是件艰苦的事情。有古谚云：“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孔子还进一步为旅游加进了一些负疚感。他说：“父母在，不远游。”然而尽管如此，古代还是有佛教僧侣去访问印度，也有太监郑和在十五世纪的著名远航——他率领皇帝的船队最远到了非洲“以观蛮夷。”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移民不断在世界各地定居，但毛泽东认为旅游业是反社会主义的。所以直到他死后的 1978 年，大多数中国人才有可能以工作或学习以外的原因获准去任何其他国家。开始时他们获准去香港探亲。到后来，他们可以去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旅游。1997 年，政府批准了在“有计划，有组织，有控制”的前提下，游客可以去其他国家旅游。（中国政府的批准是和地缘政治挂钩的。在 2005 年，当瓦努阿图同意不再给予台湾外交承



认之后，那里便获准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百分之八十的中国游客首次出国都是组团前往。他们很快便赢得“热情洋溢——偶尔有点过于热情——的游客”的声誉。2005 年在马来西亚的一家赌场酒店，大约三百名中国游客发现拿到的特餐优惠券上印着卡通猪头。酒店解释说这只是为了区分中国客人和不吃猪肉的穆斯林客人，但感到受了侮辱的中国游客举行了集体静坐，并且高唱国歌。

大多数国家都是当普通公民拥有了五千美元的可支配收入之后，才开始涌现出大量游客到国外旅游。但是城镇居民收入现在刚到这个水平一半的中国，却依靠数量巨大的团购票，以及对偏远的郊区酒店无情杀价，使这种旅游变得价格适中。去年有超过 5700 万中国人出国，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位的国际旅游业大国。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 2020 年前，中国的旅游人数还将增加一倍。

最初，欧洲并不是一个旅游热点。在 2000 年，中国到澳门的游客人数，比其去所有欧洲国家的游客人数加起来还多。但渐渐地，中国游客开始按自己设计的路线搞起了豪华游。正如官员们曾一窝蜂似的朝拜马克思故居一样，中国的文学爱好者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来到剑桥大学的校园里，看一眼泥泞河岸两侧的成排柳树。曾在西方学习过的徐志摩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二十世纪初的诗人。他在诗里把那些柳树形容为“夕阳中的新娘”。当我前不久穿过剑桥校园时，就曾见到中国游客在河边摆姿势照相，而其他游客则漫步而过。王义雄是一位来自河南省的 23 岁的物理学家。这已是他第三次到这里来了，但这次他还带着面泛羞涩的经济系学生陈思。“不久之前，我们彼此相爱了。”他告诉我说。“剑桥是一个浪漫的地方。”

法国雅高酒店集团开始在宾馆里加装中国电视频道和增加说普通话的员工，其他饭店则也在按照风水原理把床移到离窗较远的位置。随着去欧洲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团费也变得越来越便宜。2009 年的一份英国旅游业报告总结道，作为一个“独特而统一的”的品牌，“欧洲游”在中国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单个的欧洲国家倘若够明智的话，最好放低姿态，推迟对“法国游”或“意大利游”这样的“子品牌”进行推广。相对于地图上的一个区域，欧洲更是一种心境。对于难得有机会旅游的上班族而言，能在一周的时间里尽量多参观几个国家是非常诱人的。“在中国，如果你能用 100 元买到 10 件东西的话，总比只买一件东西要好”李导说。

我和一对上海来的年轻夫妇一同从马克思故居信步踱回巴士。妻子叫郭艳瑾，今年 29 岁，性格随和。她自称凯伦（Karen），在一家汽车配件公司的财务部工作。丈夫顾晓杰是环卫部门的行政人员，英文名字叫汉迪（Handy）。汉迪很潇洒，有副橄榄球前锋的身板，身高



1.83 米，胸部厚实。他穿着栗色毛衣，上面有个高尔夫球袋装饰，不过当我问及他是否是高尔夫球手时，他笑了，说“高尔夫是有钱人的运动。”

为了这次旅行，汉迪和凯伦攒了好几个月的钱，而且接受了其父母的资助。李导怂恿我们不要因为太操心钱的事而糟蹋了这次旅行——他建议我们不要把标签上的价格当成欧元，而假装那是人民币——但是汉迪和卡伦仍然精打细算。几天来，他们能跟我说出我们在五个国家买的每一瓶水的确切价格。

回到车上后，金色巴士继续在法国香槟—阿登大区（Champagne-Ardenne）颠簸西行。车窗外是萧瑟的矮树。一直对效率要求很高的李导打算特别破例一次。他说，”我们得习惯这个事实，欧洲人有时候行动缓慢。”他接着说，在中国购物的时候，“我们常常三个人同时把要买的东西摆在柜台上，年纪大的女士给三个人找钱都不会出错。但欧洲人不那样。“他接着说，“我没有说他们笨的意思。他们要是笨的话，就不可能开发出那么多需要精细运算的技术。他们只是处理数学的方式不同罢了。”

谈话结束前他给了些建议：“让他们照自己的方式来吧，因为我们太着急的话他们会觉得被人催着，那样会让他们脾气不好，我们还以为他们在歧视我们，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他还不时地对欧洲的生活水准之高表示惊叹——用波尔多酒的平均价格或者营养好的荷兰人的平均身高等统计数字对我们进行狂轰滥炸——也许以前中国游客会对欧洲经济表示赞叹，但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李导对地中海的生活方式做了个很精彩的展现：“慢慢醒来，刷牙，泡一杯浓咖啡（espresso），在咖啡的浓郁香气中啜饮。”大家都笑了。“以那种节奏生活的话，他们的经济怎么可能持续增长呢？不可能。“他接着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老百姓勤劳苦干的国家经济才会增长。“

我打了个盹，醒来时发现已经到了巴黎郊区。我们的车沿着塞纳西岸前进，太阳穿破云层的时候我们正好经过了奥赛博物馆。李导叫道：“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开阔吧！”一阵相机快门的咔嚓声过后，他指出了巴黎市中心没有摩天大厦这个事实。”在上海，除非是站在黄埔江边，否则你不可能对它有什么感觉，因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欧洲人，“他接着说，“保留了所有古老而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在阿尔玛桥（Pont de l’Alma）旁的一个渡口登上了一艘双层船。船在“突突”的马达声中逆流而上，我开始跟朱忠明聊天。他 46 岁，职业是会计，这次偕妻女同游。他在上海长大，当他开始进入房地产业淘金的时候，上海的房市正一片红火。“无论买什么都能大赚一笔，”他说道。朱忠明很有魅力，宽阔的脸颊上有两个酒窝，脸上总是挂着一个坏坏的微笑。他从 2004 年起就常常出国，所以旅行团里的其他人都喜欢听他的。欧洲对他的



吸引力首先是“文化”（在中国做的调查中，在中国人对于欧洲的联想中，“文化”常常雄踞榜首，对欧洲的负面联想中，前几名包括“傲慢”和“劣质中餐”等）。

到了苏里桥后，船缓缓掉头向下游驶去，在塞纳河上划出一道白色的浪沫。朱说，中国人对欧洲的兴趣蕴含着深层的个人动机。“当欧洲人主宰世界的时候，中国也很强大。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落后？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确，为何一个早于古登堡 600 年发明印刷术的文明会在十五世纪江河日下，这个问题就像中枢神经一样贯穿于中国对自己的过去和复兴前景的分析之中。朱的解释是，“当受到侵略的时候，我们没能迅速作出反应。”这是我在中国常听到的一种对于遭受劫难和国势衰落的（原因的）说法。（至于其它因素，历史学家也倾向于指责官僚体制和极权主义造成的万马齐喑。）不过朱没把中国遇到的所有麻烦都归咎于外国侵略者。“我们抛弃了自己的三个核心思想——佛教、道教和儒教——那是错误的。从 1949 年到 1978 年，我们学的都是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他停顿了一会，看了在栏杆边拍照的妻子和女儿一眼。远处，一轮橙色的夕阳正要没入这个城市。“我们现在知道那是场灾难，可它占去了我们 30 年。”

船停靠码头后，我们穿过如织的人群前往饭店，这是我们踏上巴黎的第一顿正餐。凯伦紧搂着汉迪的胳膊，两人四处张望着。我们跟着李导进入一家临街的中餐店，拾阶而下，来到一处闷热、幽闭的过道，它的两面都是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面挤满了中国食客。大街上是看不到这样的热闹场面的，里面和外面就像是两个并行的巴黎。由于没有空闲的座位，李导示意我们从后门出去，然后左转，来到第二家饭店，也是中餐馆。沿台阶而下进入另一间无窗的房间，一盘盘菜肴端上桌来：红烧肉、炒白菜、蛋花汤和辣子鸡。

二十分钟后我们沿着台阶走出去的时候，外面已是夜晚。我们匆匆跟随着李导穿过街区来到老佛爷百货公司（Galeries Lafayette）。这是栋十层高、坐落于奥斯曼大街的百货大楼。它看起来乐于迎接来自东方的扫荡。为了迎接兔年新春，大楼的外面悬挂着红色彩带，并以兔宝宝的卡通形象来装扮。我们收到了中文书写的优惠卡，里面寓意着幸福、长寿，还附带了 10%的折扣。六楼有一间名为“四川熊猫”的饭店正在供应晚餐。

我们这个旅行团的目的地明确。许诺和他的父母，后面跟着朱忠明及其家人，右转，经过劳力士专柜，直奔窗明几净的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精品店。一群讲普通话、佩戴统一样式围巾的售货小姐，在专柜那儿服务着。据购买免税品退税服务商 Global Blue 的数据显示，每个中国游客在国外平均会购买超过 1000 美元的免税商品——相比其他国家（包括日本）的游客而言购买了更多奢侈手袋、手表和名牌服装。中国游客在国外购物的花费几乎是住宿的两倍。旅行团里一些人向我抱怨说，行程中没有“Aotelaise”这一站实在是



一大憾事。Aotelaise 这个词让我感到很困惑。有人解释说，那是个新的汉语词汇，即“名品特价店”（outlets）。

许诺的妈妈李英，抽出一叠打印了手袋资料的纸，上面印着手袋的图片和商品编号。她试了一个又一个，在镜子前晃来晃去，对自己的形象不太满意。汉迪和凯伦看了一下价签就继续往前走了。朱忠明催促李英快点找到一款“更贵气”的。“那个看起来就像我们在内地买的垃圾货，”他说道。她又试了一款名为艺术范儿的大大的提包，售价为1400美元左右。背带呈黄褐色，巧克力色的背面满是微小的LV字样。“这个怎么样？”她询问大伙的意见，每个人都点头。“我就买它了”。

那晚，我们入住了郊区一间叫梦幻城堡的酒店。大堂内饰有纹章和一个巨大的身着长袍的国王塑像。

第二天早上，在前往埃菲尔铁塔的途中，我们遇见了一群非洲裔街头小贩，李导说起巴黎对于非法移民来说就像磁铁一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没有户口”，他说，“为什么政府不抓他们呢？那是因为拘捕、养活那些人并把他们送回家太过辛苦，他们可能第二天又会马上飞回来啦。”我没从他的话里听出多少同情的意味。华人曾是全球数量最庞大的移民群体，但如今很多人认为在国内的工作前景比国外更加光明。李导开玩笑说，欧美人应当对囤积优质房产的中国游客多留点心眼。“欧洲经济正陷入衰退，”他直言不讳道，“现在轮到我们扬言吐气了。”

他指着法国议会大厦周围的空地说，那儿就是最近市民抗议提高退休年龄的所在。他对此感到困惑。“一个工人天天罢工的地方经济能够增长吗？当然不行，”他说。“很奇怪，这儿的人对此却习以为常。关于公众游行示威的法律相当成熟。只要向政府申请了，你就有权按预定的路线去游行示威。”这就是他们“要求实现自身权利的常规手段”，他继续说，不过他认为那样对旅游业不利。“你可能由于街道交通堵塞而被堵在某个地方长达四个小时。希望大家永远别遇到那么糟糕的状况。”

上午不到十点，我们已经参观完埃菲尔铁塔，并动身前往凡尔赛宫。一个讲汉语的导游在大门口迎候我们并引着我们上楼。在玛丽王后的一处殿堂里，亦即她举办贵族沙龙的场所，那个导游指着一个蓝色的花瓶说，那是个精美的中国瓷器，从中国盗来后摆在此处。他还说，镜厅不仅是皇室节日聚会的场所，1919年6月凡尔赛和约也签署于此。它因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移交给日本而在中国历史上臭名远扬。

在卢浮宫，接待我们的是另一个讲汉语的导游，一个小巧玲珑的妇女。她喊道，“在一个半小时内我们有许多东西要看，所以要走快点！”她举着一把收起的紫色雨伞冲在最前面，



雨伞被她当作集结用的小旗。在没有放慢脚步的情况下，她教我们用中文发音的法语词汇：bonjour，其发音可近似发成中文里**“笨”**（ben）**和“猪”**（zhu）的音，意思是“向某人问好”。我们跟着她匆匆走过旋转门时，王振宇——那个裤子生产商，对着保安操练他刚学会的法语：**“笨猪，笨猪！”**

导游提醒我们要特别关注卢浮宫的三件镇馆之宝—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米洛的维纳斯和蒙娜丽莎的微笑。我们轮流拥挤着围观，身旁都是来自中国的其他旅游团，可以通过特有的标志辨认出各自的团员：戴着红色胸针的是 U-Tour 旅行社的，穿着橙色防风衣的是从深圳来的一批学生。天还没亮，我们一直马不停蹄地参观，仿佛空气中弥漫着好奇和求知的气息。当发现电梯离我们的路线要绕很长一段路之后，我不知道黄雪晴（音译）将如何坐着轮椅参观完博物馆大部分地方的。后来才发现当她一瘸一拐的上下那些大理石台阶时，她的亲戚们会帮她抬轮椅，然后再将她推到每一幅大师杰作的跟前。

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结束了今天游览欧洲最佳景点的行程，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这似乎激起了我们比较中西艺术的兴趣。当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等位的时候，朱忠明提起了周王朝（公元前 1046-公元前 256），那个诞生了孔子，老子等中国思想大家的朝代，对我们说：“那个时候的中国真是太伟大了！”他的妻子王剑心（音译）瞥了他一眼，说道：“你又来了，总是说这老一套。”朱忠明戴着刚买的带电灯泡的埃菲尔铁塔的棒球帽，转过来看着我，希望能得到一点回应。“这是真的，周王朝实际上可以和古罗马或古埃及平起平坐。”

他的妻子不时瞅着餐厅里面，不耐烦地问：“我们还要等多久啊？”有人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去麦当劳也许能更快吃上饭，这又引起了一个新的话题。“北京是不是有世界最大的麦当劳啊？”他问我，我不确定，可他却十分肯定地感叹：“上海君悦大酒店的那个麦当劳真是太大了！”

欧洲文化之旅曾是 18 世纪英国年轻贵族遍游欧洲大陆的一种教育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学习新的语言，收集古玩，同时也沾染了各种花柳病，现在其已成为新贵国家的传统之一。在 19 世纪中期，随着铁路的出现，大量英国中产阶级蜂拥而出，“这些没几个钱的小人物们，忽然开始肆意践踏和破坏阿尔卑斯山。”后来成为英国驻法大使的诺曼比公爵轻蔑地评价道。

铁路使得教师、工程师和公务员在 24 小时之内从伦敦来到阿尔卑斯山成为可能，而不用再像《大陆的气息》（理查德穆伦 Richard Mullen 和詹姆斯蒙森 James Munson 合著的一本关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游记）书中所说的需要坐上一个礼拜的马车。在瑞士，伦敦人以



及后来的美国人尽情享受新鲜的空气，但他们也有颇多其他的抱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觉得威尼斯除了“破旧的西洋景和市场”之外便没什么可看的了。当然，人们抱怨得最多的还是食物：“黄油炖出来的”法国菜和“只有一些可怜兮兮的咖啡，巧克力和面包的”早餐。马克吐温（Mark Twain）根据 1867 年到欧洲和地中海东部的旅行写成了《傻子出国记》，书中描述到美国旅游者说话又大声又粗野，当其他人都非常安静，规规矩矩的时候，美国人却肆无忌惮的大笑。但是，整个旅行一路走下来之后却让这些旅行者的行为有了极大的改观。正如英国诗人萨穆尔罗杰斯所说的，旅行在他们心中播下了质疑自身缺点的种子。

到了旅途的第四天，我们不再对早上坐三个小时，下午再坐三个小时的大巴，而只有中间安排了游览的短途旅行有任何异议。当我们停下来补充能量和上厕所的时候，我们只和旅行团的驴友们说话。我们就像一艘移动的且自给自足的豪华旅游客船。从地图上看，我们的路线宛如北斗七星一般，从德国出发，绕过卢森堡后进入巴黎，在法国南部绕了一个大圈之后，翻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到意大利，然后延伸至罗马。旅途本应该在那里结束，却来了个后转弯，又顺原路折回到米兰，从那里再飞回中国。（“每一条线路主要都是由飞机票的价格来决定的，”李导和我这么解释说。只要某天哪有最便宜的机票，中国旅行社就能逮着这个机会。）

在我们从巴黎开到阿尔卑斯山的七个小时路程中，李导用大巴上的 DVD 影碟机播放了《茜茜公主》（1955），这是一部关于巴伐利亚伊丽莎白公主的奥地利浪漫爱情电影。电影中充斥着翠绿的山坡，跳舞的长裙，以及奔腾的管弦乐。《茜茜公主》有中文配音版（还记得“你好，弗兰茨！”这句台词吗），20 世纪 80 年代时在中国的电视上播放并引起轰动，在中国父母一代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它对大巴上的小孩们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许诺从他的双肩包里拿出来一份皱巴巴的《华尔街日报》，那是他在卢森堡的酒店里随手拿的。他安静地读着每一页，当遇到一条与中国相关的新闻时便用胳膊肘捅捅我：“欧盟发现华为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新闻里说欧洲贸易官员相信华为这家中国的大技术公司从国有银行得到了极低利息的贷款。许诺问我：“美国宪法规定了企业不能接受政府的支持吗？”

不幸的是，《茜茜公主》是系列影片，一共有三部；我们咬着牙继续看第二部。我问许诺上不上 Facebook。在中国国内，Facebook 被官方屏蔽掉了，不过人们仍然可以通过某些翻墙技巧登录。“上那个网站太麻烦啦。“许诺说。他改为使用“人人网”，这网站相当于 Facebook 的中国版本，与很多国内的网站一样，任何敏感的政治讨论都会受到审查。我问许诺，关于 Facebook 被屏蔽的事情，他知道些什么。“跟政治有关吧。”他说，然后停顿



了一下。“但我确实不太清楚。”我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一种疏离感，这种态度在那些彬彬有礼的中国学生中并不少见。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能接触大量的科技和信息，然而当局设置的障碍足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大家都懒得去挑战那些麻烦事。层层过滤后，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如此古怪：许诺可以详尽地和我讨论苏菲·马索的最新电影，或者是各个瑞士赛车手的优胜之处，但对于 Facebook 在阿拉伯国家人民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却一无所知。

我们在一个叫因特拉肯的瑞士小镇停留。李导向我们保证，这儿有“真正的新鲜空气”，对于任何中国大城市里的居民来说，这都是一个优待。我下了车，与郑道（音译）和她的女儿李程（音译）一起，到小镇里四处看看，李程今年 19 岁，是学艺术的。我们一路闲逛，经过几间名牌手表店、一家赌场和荷黑马特广场。广场上有一大片绿地，岳德尔调歌唱比赛（注：瑞士的一种传统歌唱方式）和瑞士摔跤比赛都在这儿举行。路途当中，郑道的女儿委婉地表示，四周的景色并不让她心动。“除了岸边建筑的样子看起来不太一样以外，塞纳河跟黄浦江也没什么两样嘛。”她说：“地铁吗？我们也有。你能说得出的，我们都有。”她笑了起来。

李程和她的朋友们走到前头去了，她的母亲告诉我，她希望女儿能看到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并非指那些“硬件”，而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的导游嘲笑了欧洲那种高贵而缓慢的生活节奏，不过郑道说，她的国人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笃信“如果你做事情不会抢先，你就会落在最后”。在人行横道前，一辆车停下来等我们先走，郑道把它和国内的情形做对比，她说：“我们国家的司机会这么想：我可不能停下来，否则，我哪儿也去不了。”

我们在因特拉肯附近乘上了一列火车，它载着我们缓缓地爬上了一座白雪皑皑的山，驶向阿尔卑斯山诸峰之间的一段鞍形山脊，那就是有名的“少女峰”。车窗外，滑雪的人穿着荧光滑雪服，从山上猛冲下来，满脸通红，汗如雨下，嘴里喊着德语或法语。而我们这一行人的穿着显然不是来登山，分明就是坐火车观光的：刘洋（音译）穿着皮革的高筒靴，李程戴着北极熊形状的白色毛皮帽子，北极熊长长的爪子一直垂到下巴。看着窗外那些欧洲人，我们都轻声笑了起来。

火车在一个宽敞的大房子前面靠站，我们下了车。这儿有好些餐厅，景色非常优美，可以看见连绵起伏的山峰和山谷，一直延伸至德国的黑森林一带。我们在 3470 米高的地方午餐，面朝伯尔尼人的草场和阿莱奇冰川吃着炒面和春卷。这里礼品店的东西定价过高，于是汉迪和凯伦只买了一张明信片寄给自己以做留念。



第二天，我们来到米兰的时候，天气寒冷而清朗。李导说这样的天气证明了“外国人为什么喜欢晒日光浴”。在中国，没有人会喜欢把皮肤晒成褐色，那儿的女人小心翼翼地把皮肤包裹起来，以免晒成褐色——那是外头做苦工的人的专利。李导说：“西方人的皮肤会晒红，然后很快就会变回白色。”他继续说道：“有些人出外晒红了以后，就回去给其他人看，大家就都知道他出去度假了。”中国与世隔绝的时间太长了，以致这种关于外国人的印象几乎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很难去除。李导通过自己的观察，准备了各种向我们做介绍的材料：南韩人长着方下巴，西方男人全身都是短短的深色毛发，意大利男人的眼睫毛很长，他们对着那些毫无戒心的女人“不停眨眼，眼睫毛像拍扇子一样”。

我们有30分钟在米兰市中心自由活动；于是我与凯伦和汉迪一道，走进了中央教堂，里面很凉爽。汉迪抬头凝视着高处的彩色玻璃，上面是一幅幅高耸的壁画。“那看起来真够让人眼花缭乱，”他说：“不过真的很漂亮。”几个小时前，李导再次提醒我们要小心小偷，不过汉迪这样说：“其实意大利还不至于像他们说得那样混乱不堪。不过传闻确实让人觉得可怕。”汉迪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环卫专家，他无法不注意到米兰街头的大量涂鸦，还有那些满得快要溢出来的垃圾桶。李导对此解释说：“政府想要清理它们，但是没有足够资金。”汉迪尽量想表现得礼貌一些，不过他还是憋不住说：“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在上海，那些老年人会给我们打一个下午的电话，不停抱怨。”

意大利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是总理贝鲁斯科尼的新闻：他和一个未成年少女上床，将面临指控。我们的李导说话可圆通了。“这男人真是独一无二啊！”他说。那天坐车穿过意大利的行程，让他不禁思考了一番国内的生活。“有时候你可能会想知道，推进民主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他说：“当然，民主有它的好处，人们享受言论自由，也有权选举官员。不过一党制也有它的好处，不是吗？”他指着窗外的高速公路说，因为当地人的反对，意大利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把这条公路修好。“如果是在中国，六个月就修好了！只有这样，才能让经济持续增长嘛。”李导对党可谓是忠心耿耿，我都快要把他当成政府发言人了；不过他的评论听起来很耳熟，在北京，这种评论在人们的日常对话里常常能听到。“外国分析师们永远都搞不懂，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可以发展得这么快。”他说：“是的，我们是个一党制的国家，但我们的政府官员都是从精英中选拔出来的；从13亿人中选出来的精英啊，可以说是‘超级精英’了。”

李导对西方的种种描述中，至少有一点他是心悦诚服的。他提到自己一个西方的朋友，辞去了工作，开始徒步旅行，找到了他人生中真正想做的事。“我们的父母能接受吗？当然不能啊。他们会用手指指着你的鼻子说：‘你这个窝囊废！’”他说。然而，在欧洲，“年轻人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



他接着说道：“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这么多东西，可是为什么我们却觉得发现新事物如此困难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体系有太多的约束。”大家都开始聚精会神地听他继续说。当美国的父母想着是否能从中国所谓的严厉而讲求实际的“虎妈”那里学到什么的时候，中国的父母却想方设法使中国僵化的教育体制恢复创造性。一位叫曾丽萍的母亲告诉我，当她决定带她上六年级的女儿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孩子的老师们都为此皱起了眉头。“每到学校放假的时候，老师们就告诉学生们，‘别到外面去，呆在家里学习，因为你们很快面临中考了！’”但曾丽萍早就是不走寻常路了。她辞掉了艺术老师这一稳定的工作，将自己所有的积蓄投在了创立自己的时装品牌上面。“我的领导们都说：‘你离开这么好的工作环境真是太可惜了！’但我已经证明自己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我们在当天下午早一点的时候到了威尼斯，大家都饿了，就算没有中国饭馆，也纷纷让李导停下来吃点什么。我们到欧洲已经一周了，可是还没在一家不是中国人经营的饭馆里吃过一顿午餐或晚餐（一份市场调查提到将近一半的中国游客在西方国家旅游的时候没吃过一顿欧洲风味的饭菜）。但是李导警告我们西餐上菜太慢，他记得有一次在西班牙吃一顿晚餐花了五个小时。“如果你吃西餐太快，会肠胃不适，”他接着说，“忍忍到下一个景点再吃。”大家都同意了，我们停下来，在市郊的宝塔中餐厅花了 20 分钟吃了顿午餐。在威尼斯，我们坐渡船到了泻湖的另一边，参观了一家玻璃厂，租了一条黑色的贡多拉，离开市里之前匆匆在一家普拉达专卖店停了一会儿。在去宝塔中餐厅吃晚餐的路上，朱忠明拿起一张当地的房地产宣传单。“看看这个——一套房才 11 万欧元！”他喊道，“比美国的房子便宜，比上海的房子更便宜！”

第二天我们在罗马的时候，在少女喷泉停留了一会。高大的塞内加尔男人正在卖仿制的路易斯威登提包。小贩推着小车贩卖便宜的磁铁和镇纸。汉迪盯着这些小贩说道：“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在梵蒂冈的时候，圣彼得广场尽收眼底，“壮观极了！”朱忠明说道，“他们的主教可以随意什么时候探出头来看到我们在下面，对吧？我敢打赌没有比这更让他高兴的了。”广场的规模也让他想到了北京。“这就像以前中国人经常到北京，就为看一眼共产党。”他笑道。

我们溜达过一个十字路口，坐在一个窗台下休息。朱忠明点了一根烟。他一直在思考大国力量的更迭。我问他信不信美国的政治家说他们不反对中国的崛起。他摇头说：“不可能。他们会让我们发展，但一定会想方设法限制中国的发展。我认识的人都这么认为。”他用他能想到的最礼貌的方式说，美国最终得像曾经的中国一样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调整到一个较低的位置，“你们美国太习惯于高高在上，但你们最终会跌到第二的位置。虽然中国的 GDP 不会马上超过美国，再过二三十年我们的 GDP 最终会超过你们的。”我很震惊朱忠



明旅行中看到的是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持久的思想差异，“两种思维方式，”他说道，“我们会使用他们的工具，学习他们的方法。但是中国基本上会一直按自己的路子走。”

他的观点没有激发我们对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未来产生乐观预期。某种程度上，我很难对此和他争辩。变富的中国即将变为西方化的民主中国，这一迷思如今变得尤为令人紧张关注。如果认为中国的开放会拉近中西方距离是幼稚的话，不考虑更潜在变化的力量也是幼稚的。中国政府天真地认为依靠引导国民使他们远离包括西方“盗匪”和西方文化在内的威胁，就能强加给这混乱的世界以秩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旅行的时候看到的欧洲是最最真实的欧洲，是一个茜茜公主从未提到过的凌乱黯淡的欧洲。然而在贝卢斯科尼的性绯闻和对中国一党政治高效的强烈信念背后，我的同伴们也点点滴滴发着欧洲的文化内涵。在这第一次欧洲之旅当中，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很多在中国不可能见到的东西，比如喧闹混乱的出版自由，长期的政治争辩形成的社会安全体制，但他们在渐渐学会全面看待这些问题。当许诺最后放下那本皱巴巴的《华尔街日报》，他一点都不吃惊奇怪或吵着说自己的新发现。他只是简单的说道：“我读外国报纸的时候，知道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们坐了三个小时的巴士去往佛罗伦萨---我们此次旅程的终点站。李导匆匆说着不同的话题，比如天主教和离婚，帕瓦罗蒂，意大利香醋，松露和闻着找松露的猪，还有标着意大利产实际是中国产的皮革制品。他说，有一次他带的到意大利的旅游团里有一个皮革厂的老板，专门花时间收集意大利产品的样品然后回到中国仿造。

佛罗伦萨的市政广场上是穿着各种粉色衣服的俄罗斯人，美国学生，还有戴着顶针状桶帽的警察。当地的向导引我们拐进一家叫佩鲁齐的皮革商店，鞋子和提包上写着“你不买一件佩鲁齐纪念品，就不算到过佛罗伦萨。”

我们就要再次坐 90 分钟的车到比萨斜塔照张相就离开意大利了。但是这时出现了意外情况：有些人说不想去。汉迪、凯伦和一些人奇怪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佛罗伦萨多逗留而不去比萨斜塔呢。李导把大家召集在巴士的阴影下面，说：“谁想去看比萨斜塔，举手。”大概三分之二的人举手了。一位女士鼓励大家要团结——“我们应该一起走。”经过一分钟的讨论，李导再次进行了一轮“民意表决”。显然一些不愿意去的人这次被排出了投票表决的过程，大家达成了“共识”，我们都乖乖地在巴士前排起队来。汉迪皱着眉头说：“中国式的投票总会是这个结果。”

在去比萨的路上，我在思考中国人这种旅行团形式的快节奏旅游还能持续多久。单独旅行在年轻人中间正渐渐流行起来，即使在这次组团旅行当中，我的一些旅伴也开始对这种匆匆忙忙的旅行心生厌倦。抵达比萨后，我们来到那游客必去的古怪斜塔下，大家依次站在



最佳摄影位上，做鬼脸，伸出手臂做抱斜塔状。头顶上是湛蓝的天空。黄雪晴从轮椅上下来，站在地上，感受着脚下的鹅卵石。我们玩得有些饿了，有了食欲，我指着离斜塔不远的一家中餐馆，汉迪和凯伦另有主意，我跟着他俩进了一家麦当劳。

（本文原载于《纽约客》，译文来自译言网，译者译言文化）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唐小兵：旅行者的噩梦



唐小兵：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师，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现代中国传媒与知识群体；回忆录、口述史与历史记忆等领域，亦为多家大众报刊撰写学术书评、专栏等。

> “文化搭台，消费唱戏，并非在绝对意义上是一件坏事，关键问题在于搭台的是否真正的文化要素。如果这样所谓的文化晚会，又变成歌舞升平的盛世讴歌，或者华丽无物的空洞抒情，甚至是一种整齐划一的极权主义美学，这又如何能够抚慰游客的心灵世界，更别说提升游客的历史与人文素养。”

对大部分生活在城市的中国人来说，旅游越来越被当作周期性提升生活品质、释放城市生活压力、亲近自然山水和传统、区域文化的休闲方式。交通网络的日益发达，也为旅游者的行走天下，创造了传统中国人不具备的物质条件。可是，如果追问那些千辛万苦的旅行者的内心感受，却往往只得到“花钱受罪”和“失望透顶”的消极答案。

一场目的明确的休闲式旅行，却往往难以调节身心和增广见闻，反而导致在旅行之前，对旅行目标地的“想象的乌托邦”，变成了见光死的俗不可耐之地，甚至会比旅行者所在的城市生活，更加难以忍受。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消逝的风景与文化

大约 10 年前，笔者曾经到过凤凰，那是沈从文的故乡，也是其小说《边城》的原型地。那时的凤凰，乡民质朴憨直，物价低廉，小城安静而缓慢，细雨中的古城墙寥寥无人，沱江水清澈见底，月色下的小城宁静悠远。那一刻，笔者真有置身小说主人公翠翠所生活的那个边城世界的美妙之感。

可是，短短 10 年，这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凤凰还是那个凤凰，却再不是沈从文笔下那个诗情画意淡泊名利的小城。急剧增加的游客，城市管理的滞后，商业气息的过度，让这个被西方作家誉为中国最美的两个小城之一的凤凰，开始迅速恶化：居住价格变得昂贵，商

品漫天要价，人心变得诡谲，江水污染严重，物欲横流在大街小巷，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这样一座以清新秀丽而闻名天下的小城，居然开始学大都市在沱江两岸引入了 10 几家锣鼓喧天声色犬马的酒吧，“如果•爱吧”、“私奔吧”、“学生年代”等各种或假纯情、或真恶俗的酒吧招牌，就那样在夜凤凰的光怪陆离之中飘摇，似乎在生硬地讥笑九泉之下的从文先生那一颗“赤子之心”。

这绝非个案，在过去的 30 多年里，经济发展主导一切，地方官员想象城市的能力和美感极度萎缩，而强行规划城市的跑马圈地能力却一路高扬。多少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被以发展的名义糊弄得支离破碎？多少老建筑、老胡同、古镇等，都被认为不合时宜而被拆毁？

等到这些城市官员发现，其实这些老字号的空间，是吸引游客甚至投资客的重要文化资源时，“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于是恬不知耻地拼接一些仿古的空间，装置出一些矫揉的文化，来忽悠游客和投资者。地方和传统文化，如果不能被纳入 GDP 增长的蓝图，便一文不值。中国的旅游景观之所以如此粗鄙，旅游文化之所以如此低俗、旅游心态之所以如此焦躁，根源之一就在于政治文化里根深蒂固的轻视历史、鄙薄人文的基因。

在工具思维和计算理性的主导下，旅游景区变得比旅游者所在的城市，更深刻地显露出一种唯利主义的面相。这样一种高度压缩的交换世界，自然不能帮助游客从日常性的焦虑中解放出来，反而让游客本就疲惫的心灵世界，更因为想象的人文世界的美好，跟现实的人文世界的破碎与鄙俗气息的强烈对照，而生发出更多无奈与沮丧。

这些年，很多旅游景区都设计了大型室外山水晚会，比如桂林的印象刘三姐、杭州的印象西湖等各类印象系列，这本是一个极佳的展示地方文化特质、叙述地方风俗人情的舞台，结果却往往让游客大失所望，这些印象系列的歌舞晚会很多将游客当弱智，将历史当玩偶，将文化当道具，大多都是高度同质化、模式化与空洞化，反讽地成为真正的“隔靴搔痒”的印象，而非文化世界的自然表达。

文化搭台，消费唱戏，并非在绝对意义上是一件坏事，关键问题在于搭台的是否真正的文化要素。如果这样所谓的文化晚会，又变成歌舞升平的盛世讴歌，或者华丽无物的空洞抒情，甚至是一种整齐划一的极权主义美学，这又如何能够抚慰游客的心灵世界，更别说提升游客的历史与人文素养。

更可笑的是一些所谓的“体验式旅游项目”，比如桂林靖江王府的仿科举考试，让游客进考棚做题，举行金榜题名仪式，还设计一位考试舞弊者被处罚示众，整个过程哪有半点对支撑中国社会结构上千年的科举文化的了解与敬重？完全是糊弄游客的噱头和搞笑的滑稽闹剧而已，这种形式非但不能增进游客对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和敬意，反而让今日的中国人



对待传统多了一份轻薄浮浪之心。而某些红色旅游胜地，更是让游客变身成当年的红军、土匪甚至是日本鬼子，扛枪骑马装模作样地行走在青山绿水之间。

文化记忆与革命往事，在这些所谓的体验式旅游项目里，成为被任意操弄的文化符号，来生产出游客的需要，弥漫着一股铜臭味。在逐利的冲动下，旅游景区无所不用其极，文化其名，利益其实，低俗成了风趣，恶搞成了创意，巧立名目宰客成了全方位开发，强迫性消费成了敬神祭祖，这真真是旅游景区的一大奇观。

异化的游客与原住民

古人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传统中国喜好游历华夏山川、体味各地风土人情者多是读书人群体，在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士人与自然和乡土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其梦想常存耕读之野趣，无论走得多远，都会心怀故土，最终叶落归根。今天周期性流动的游客，相对于那些自然和人文景观而言，则更多的是突然的一次性的介入者。对于那些被游览的乡村世界来说，游客是匿名的、分散的、强势的，游客表征着城市生活的现代和富有，这是一群有消费能力或者说购买力的人。

游客带着现代生活的标准来到欠发达地区，这种标准让他们苛刻地审视景区的一切，包括卫生、管理、秩序、便利等，这些无疑是长期性的都市生活赋予他们的，用这样一套眼光来观察景区生活，自然会滋生种种不如意的心绪而牢骚满腹。而事实上，游客使用的这套现代生活的逻辑和规则，大都是对他们的生活世界构成系统性的隐性压迫的机制之一。旅游原本是为了从这套机制里短暂地修复过来，寻求内在的精神自由和心灵释放，而游客的生活惯性，却常常使他们对于旅游景区的“不方便的现代”颇多批评。

旅行者总是试图寻找一个更具有本真性、更自然的生活和景观，总有一个想象的原生态文化的乌托邦，却不知道旅游这种现代的行走方式、观光客这种现代的流动人群、旅游开发这种现代的经营方式，本身就是反自然甚至反文化的，旅游者的行为与其预期目标之间有着难以解套的吊诡。

对于景区的原住民来说，旅游业的开发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提升、多元的城市文化，却也带来了种种问题，比如生活水准的两极化（靠近旅游路线的住民与远离旅游路线的住民）、原有的自成一体的生活世界的瓦解、商业和随之而来的急功近利生活态度的侵入、自然生态的被侵蚀等。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深刻的旅游竞赛的悖论统御着那些少数民族村寨、原住民生态文化：一方面，这些处于中国边远省份的旅游景区，必须尽可能保持一种原汁原味的地方风味来吸引远道而来的游客，要尽可能展示地方文化、艺术、日常生活和器物等的特质，换言之，



必须构成一个相对于现代都市世界的“他者”，这些旅游景区才具有一种“前现代”的文化魅力，这就导致旅游景区之间甚至旅游景区内部的“竞赛机制”，在迎合游客口味、取媚都市人群的心理驱动下，尽可能以一种穷形尽相的方式将自身所处的文化形式包装、改易，这种在游客面前刻意的展览和兜售自我，无疑是一种文化与人格上的自我矮化。

另一方面，旅游意味着现代世界的勾连，这种季节性的流动和介入，直接地将一个迥异于原住民生态的生活方式带入他们的视野，不断地对原住民固有的生活世界和价值观构成挑战和压力，原有的自得其乐的生活被撕裂，甚至在价值上被贬抑。

那些旅游目的地和原住民们，既无法回到那个虽单调却也知足常乐的过去，又无法像大都市来的游客那样彻底地现代，他们会发现，作为一个原本有一整套生存逻辑与法则的群体，居然在旅游开发的进程之中，变得越来越具有寄生性和依附性，这种寄生性也就是原住民越来越依赖一个商业的网络来构建生活。他们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收获了财富，却似乎失去了自由，尤其是心灵的自由，利益的法则开始穿透他们的日常生活。

发展，对于旅游景区来说是一种难以抵抗的诱惑，而这种发展其实往往在对他们引以为荣的文化与自然，构成持续性的侵蚀和毁坏，更重要的是，在被发展主义所绑架的地方政府、渴望发家致富的原住民，以及用消费主义心态面对旅游景区的游客那里，这些破坏和侵蚀都不成为一种具有当下性的紧迫问题。

这样的旅游，最终的结果正如尼采的一句箴言：一只鸟儿去寻找笼子。本意为寻求自由的旅游，却成了作茧自缚的行为，而这个压抑人性、自然和文化的笼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上述三种角色合力参与制造的现代性牢笼。这样的旅游开发，岂非南辕北辙式的文化自毁？而这样的旅游，更像是一场永远无法达到真实目标的梦游。

本文选自唐小兵新书《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高玮呈：你的旅行是“增强人生厚度”还是“移动身体”



高玮呈：台湾师范大学学生、师大公领人、AIESEC 副会长。期许自己成为一位很有影响力的“青年共学者”，用年轻人的力量去带动世界的正面改变

> 最惨的就是那些“为了旅行而旅行”的人，在美丽的异地流连时却被“盲目的旅行”蒙蔽，好像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行程塞到最满；或是找一间象样的纪念品店，杀它个片甲不留。换来的是类似“我曾经去过……”的表面战功，没有类似“那趟旅行让我发现……”或是“那趟旅行后我下定决心……”之类的生命反思，这种行为就好像“原地踏步”一样，相当可惜！

2012 年的夏天，我给了自己一趟 5 天的马来西亚行，这一趟旅程让我审慎地重新思考旅行与生命的关系，原来它俩就像双胞胎一样密不可分。

在一间位于吉隆坡中国城附近的青年旅社，我遇到了一位来自法国的旅人。那时他已经在亚洲旅行了半年，香港、新加坡、日本、越南、寮国、柬埔寨……每个地方都待上个十来天，通常也没有安排规划。他享受漫无目的的感觉，感觉腻了就换一个国家。这些听在我耳里近乎 “梦幻”的旅人生活，让我不禁兴奋又羡慕，但是他的一番言论却点醒了我：

“其实你不用羡慕我，像你这样拼命工作后出来旅行才是好的。当你旅行久了就会发现，如果人生没有目标或是正在努力进行的工作，它其实非常乏味。看来看去不是人文景观就是自然景观，你只是例行性的移动自己的身体、穿梭在不同地方罢了。”

我开始反复咀嚼他的这段话，并延伸出三个大哉问：

人们为什么要旅行？



大部分的旅人有在旅行中实践旅行的目的吗？

平常的生活经验和旅行经验会互相影响吗？如何影响？

透过回答这些问题，我形成了一套自己对旅行的见解。或许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法，但我因此而受益良多，因此想和读者们分享。

一、旅行的基本特质是让人身处“异地”，加速“反思”的进行

当我们提到旅行时，直觉是“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方”。身处异地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当作理所当然，这加速了我们脑袋中“比较系统”的运作，会自然而然地去想：这跟我原本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吗？

所谓的“异地”并非一定指的是“地点的相异”，就像大部分的人以为旅行一定要出国，但是其实只要让自己体会和平常生命经验中“不一样”的事情、做不一样的尝试，都可以是一种“置身异地”。譬如说登山或是上教堂、偶尔跑到青年旅舍去住、吃自己本来讨厌的东西、穿背心上街等等……食、衣、住、行、育、乐，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身处异地”。

例如我在印度的时候，想要叫车却非常无奈，因为练了十几年的美式英文，不论是听力或口说，在独特的“印式英语”面前都无用武之地。原来在台湾每天上下班那么的容易方便，既没有漫飞的尘土、凹凸不平的路，也没有鸡同鸭讲的司机与蛮横无理的乘客，好不幸福。

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经验也可以是有趣的，至少我也没想过在上班或前往一个目的地的路上，可以充满荆棘与挑战；反观自己在家乡的生活，好像每一件事情都有美好的规律，每一件事情都应该依照某种期待去运行，很难有超越期待的惊喜发生。

二、“反思”是为了“改变”，为了推进生命的“前进”

身处异地让很多的比较可以发生，我们可以选择只是让它闪过脑袋，或是积极的思考：从这些比较中我发现了什么？这些发现有助于我改变现状吗？

当我们回答这问题时，“反思”就发生了。我们通常在想要改变的时候才会反思，所以我觉得旅行不该是例行性的公事，应该是在一个人想要“改变”现状的时候发生，或着是应该要在旅行的时候寻找一些可以让自己变的更好的线索。如此一来旅行就很难乏味，每一次的旅行都可以积极推进我们的生命去“前进”。

三、旅行*工作 X 生活 = 生命的广度 X 深度 X 厚度

根据上述两点推论，在 “异地反思”前若没有丰富的工作或生活，可能就没有太多感受与经验可以去做连结，反思就比较难以进行，也比较难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那些平时在原地认真工作、生活的人们，平时靠工作累积了丰富的 “深度”，因生活琢磨了足够的 “广度”，当旅行所带来的异地反思发生时，所见所闻就有很多再诠释的空间，也会因为连结而产生很多灵感与想象。这样的反思搭配原本累积的深广度，让生命更加丰富。我喜欢用增强了 “生命的厚度”来形容，这种生命厚度不会消失，也难以被取代。

对于那些工作、生活一成不变的人，缺乏生命的深度与广度， “异地反思”为其生命注入了新的刺激与可能性。回到原地时，让人有了一个动机，透过工作与生活的调整重新打造自己的 “三维生命面向”。

最惨的就是那些 “为了旅行而旅行”的人，在美丽的异地流连时却被 “盲目的旅行”蒙蔽，好像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行程塞到最满；或是找一间象样的纪念品店，杀它个片甲不留。换来的是类似 “我曾经去过……”的表面战功，没有类似 “那趟旅行让我发现……”或是 “那趟旅行后我下定决心……”之类的生命反思，这种行为就好像 “原地踏步”一样，相当可惜！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我觉得很好的旅行型态和旅人态度：

大旅行：对工作和生活极度不满意的时候，你应该给自己一段时间的逃跑（至少一个月），逃到一个对你来说非常不能理解的 “异地”，给自己一个承诺，希望透过异地反思获得一个新的生命态度。回到 “原地”时，用新的态度去面对旧的环境，抑或是换一个新的环境。

旅人态度：这一趟旅程结束后，生命一定要改变。

中旅行：工作、生活过得去，但是慢慢感觉到无聊、一成不变，这时候需要大概 “一个周末”的短期逃跑，这会让我们的工作、生活恢复弹性。

旅人态度：我需要充电，让原本的生活更多采多姿。

小旅行：平常就很懂得享受工作、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在做新的尝试，每天都在累积生命的广度、深度、厚度，新的一天就是一场新的小旅行。

旅人态度：我是生命的旅人，无时无刻都在尝试、反思、享受，累积生命的面向。

想要什么样的旅行，拥抱什么样的旅人态度，决定权都在我们自己身上。享受吧，让我们一起做生命的旅人。

（本文原载于关键评论网）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清醒着去旅行┫

“

一个旅人以为一个旅人以为只有他是清醒的，因为他是站在别人世界之外的观察者。事实上，只有他是最迷惑的。因为他总是在状况外。---《旅人》

”

林达： 走向世界的起点



林达：美籍华裔作家夫妇

“

进入一种模式，就可能进入一条轨道，旅行可能为了写作而规划，阅读可能变为数据查询而失去乐趣，写作可能成为一个必须的工作，生活和你的初衷就在不知不觉中变味。你向着一个方向走了很多年，山重水复，什么障碍都越过，却可能在平原轻轻易易就迷失自己。于是，我在想象中回到那个原点。

”

我们已经忘记有过这样的日子，人们习惯被户口粮票囚在自己居住的城市里很少出门。接着是突然而来的 1966 年政治风暴，目不暇接的意外塞爆了火车。未成年人像包裹一样摞在车厢中被送到路上，出门却并非以旅行的名义——领袖召见且令他们去散播革命火种。他们就在点燃青春的同时，焚烧能够找到的所有书籍。无知无觉中，顺便也毁了自己未来阅读的机会。趁一片混乱我也出了门，父母竟然同意我的看法：若能居无定所浪迹在外，也



定比夜夜睡在家中床上更加安全。我迷迷糊糊用十四岁的脚步翻山越岭，走出千里之外，却仍是一次不成功的逃亡。

再次出门，已是两年之后。从南方北上五天五夜，我辗转抵达当年签出《瑷珲条约》的江边小镇。五月冒尖，江南早已花红柳绿，这里却是冰封半年之后刚刚开江，天地间尚无一丝柔情绿意，滚滚而下的冰排把黑龙江变成一条浩浩荡荡的辽阔冰河，冰流隔开了我们和那个苏联小城海兰泡。那一刻完全忘记了下游的珍宝岛，中苏刚刚在那里打了一仗，也忘记了我们被送到这里来虽非士兵却为着“戍边”的布局。隐约之中，那首叫作“黑龙江波涛”的苏联手风琴曲在心中响起。我对自己说，这是货真价实的西伯利亚啊，最低气温零下四十八摄氏度。小说中读过的冰雪覆盖的俄罗斯，真的就活生生站在我们面前。望着对岸建筑上的列宁像，我开始试着理解国境线的意义。

我想看看对岸列宁像背后的生活，仅仅是出于好奇——哪怕是看列宁像，我也希望走近去看。可边境线是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我也已经学会万不可透露那一点点好奇，那是对好奇心不予承认的年代。旅行的好奇心假如越出国境线，不论向哪个方向，都等同有叛国和投敌的意图，而当时的法律给意图甚至遐想定罪。今天的人理解冷战，会把红色国家都扫作一堆归在一方，岂不料它们之间也兵戎相见，如我眼前的中苏两方，此岸与彼岸正不共戴天。我们裹着离开学校前领到的厚厚棉衣，头上扣着翻下耳朵的棉帽，一色的国防绿，没人能看出里面有一半是女孩。当时真没有一点点预兆，将来某一天，我们中间会有人合法领到护照、越过国境，远远飞走。

最初的国境线经验，让刚刚涉世的我加深了对文字的怀疑，知道有一类被称作宣传的文字是靠不住的。怀疑的萌发，最初始于文字急剧下滑、流于粗鄙，后来更引出铺天盖地的颂扬文字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我在国境线旁第一次试图对中苏现状作出自己的判断，无师自通地发明了戏称“国境线人群流向检验”的国家综合状况比较法。我假设，眼前双方的国防兵和国境线瞬间消失，而两国百姓突然被告知可以自由通行，我闭上眼睛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一开始定是一片混乱，大家都和我一样充满好奇，要去没有去过的地方看个稀奇、看个究竟。然后，假如两国间有很大差距，优劣高低将立见分晓。这里一定开始出现拖儿带女、背着包裹的定向人流，而流动的方向，就应着那句古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这发明其实只是一个现状推理。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中苏两国，尽管社会制度相同，两边的越境状况却并不对等。苏方过来的几乎无一例外是谍报人员，而我们这里夜黑风高在冰封的江面冒死跑过去的，大多数是和我们一样无知的青少年，理由如此简单：此岸的校门都对我们关上，而对岸的学生们至少还在正常上学。



此后，再读俄国小说、看巡回画派，总能穿过书页透过画布看出西伯利亚厚厚的积雪来。

一个朋友冲进小屋激动万分：“人类已经上了月球，看看我们还在干什么！”

我们寻找不同的借口回到出生的城市，整日游荡，有的是时间却无书可读。在力气无限、好奇心也无限的年龄，我们发现眼前的世界着实令人沮丧：书已经被烧得所剩无几，我们视野局限，划地为牢。不仅是阅读，各路音乐戏剧诗歌电影摄影绘画都统统消失，只留下革命的那一路。等到烧书的同龄人醒来，“烧”万漏一、幸免于难的书籍早已迅速钻入地下，突然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唯余几堆灰烬。这时，烧书和被烧书的我们几乎一起陷入痴迷，转身不假思索、上天入地追猎残留的书籍。我们以奇怪的方式阅读。先从读到某本书的幸运儿那里听得片断和转述，然后记住书名四处打探，直到最后从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那里，七拐八弯地把书借到手中。然后，自己就成了那个能够转述故事的幸运儿，绘声绘色地在另一批同伴中掀起另一波觅书的疯狂。

书籍向我们慢慢打开国门，我们在书籍中慢慢展开少年人的想象。我们游荡在一个个陌生国度的陌生乡村，游荡在一个个陌生城市的陌生街道，无声无息，如同忽暗忽明的幽灵，常常不明白虚幻的是世界还是自己。我无数次在梦中打点自己的行装，醒来却还是滞留在头上一片红旗、身上一片灰蓝的围城里。一切丰富的色彩都由书籍引出，又留在书中。我心中的良性循环是这样的，阅读带来旅行的向往，而旅行又诱发深入阅读的兴趣。而我们年轻的循环，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个人世界，一切尽在想象中。我们在书籍引领的想象中认识自由，也开始体验这种独特的自由。那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如同天使伸出手来，感觉自己飞速上升，发现自己的思维突然脱出环境的桎梏，突然有一种灵魂飘荡在空中的超逸。

是的，今天我还记得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只能叫做超逸。周围世界突然和我没有关系，我自由而且年轻，我虽然生活在一个单色的世界，却相信世界不会永远单色、不会永远是我看到的那个样子；我虽然无法走出去，却知道天外有天、世界上还存在另外一个世界。

脱离周围世界，我们成为特殊的一群，在各个角落都有这样的年轻群体，悄悄聚在一起。然而，无奈感仍然时时袭来。我记得我哥哥一辈的朋友告诉我，在人类第一次登月的消息传来，他们正在一个小山村里。一个朋友冲进小屋激动万分：“人类已经上了月球，看看我们还在干什么！”我们在干什么？我们无奈地被隔绝在完成学校教育和实现所有梦想的机会之外。这样的经历形成了一代人的逃离渴望，无论是怎样方式的逃离。我们似乎早已准备了一万年，也等候了一万年，把自己铸成搭在强弓之上的一支飞箭，就等待无形铁幕被挤出一条缝来，然后就会自由飞向天空，哪怕焚毁在自由之后的瞬间。



我看同龄人回忆那个年代，常常更多记得恐惧、压抑，甚至因此久久留在无形的阴影里。不知为什么，我更多记起的，是那些未曾谋面的作者译者引领下的欢乐时刻，记起自己超越恐惧的那个转折点。强势制造的恐惧还在那里，可是你自己骤然改变、变得能够面对世界也面对自己。那一刻你看到“强大”的虚妄和虚弱，你发现自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弱者，心中有一样东西在壮大起来。在周围的人都关心这个世界是不是红色政治正确的时候，你开始关心自己是不是和能不能做个诚实的人加入良善之列。书籍告诉了你，你知道另外还有一个世界，在那里，微笑是相互认同的依据，心里开始有了期待和被期待的朦胧。这样的记忆开始在我的心里扩展而压倒一切。我也因此开始相信，有能力步入阳光，才真正开始拥有在阳光里生活的能力。

一代人有自己的历史特征，也有它独特的历史责任和局限，以及等候他们的同一口历史陷阱

我突然想到，在那个时代，书籍是一种特权，阅读是一种特权，人变得正常敏感、人得到帮助和提升，竟然都曾经是一种特权。甚至那种特殊的无奈感和逃离渴望，都源于这样一种特权。我们大多数的同龄人，在人类首次登月的那天，可能没有得到消息，也没有感受刺痛的机会。他们在劳作中麻木，他们也许也找过，却没有那份幸运，找到和读到我们当时读过的书籍。

在 1976 年中国突然结束“文革”之后，我们看到了自由的开端。但那时，汽车和出国还是同样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我能够拥有的最大梦想，就是骑着自行车游遍中国。可惜这样的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行。我抓住一切可能的旅行机会，哪怕背着大包一次次在山中孤行。我在充满浓浓烟雾、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摇摇晃晃站立三十个小时，或是独自搭着牛车摩托车、搭着手扶拖拉机，在颠簸的小路上穿行，我是为了看一眼没有看见过的古刹？抑或只是为了告诉自己确实自由地走到了一个没有到过的地方？我不知道。还记得千辛万苦来到深山，和唐代古殿唐代彩塑静静相对，不敢相信，久远期待的历史撞击，真会在心中留下永久的震撼。只要活着，闭上眼睛，那一刻的惊艳，就活生生在眼前再现。

所以，在离开国境的可能终于出现的时候，只要可能，我们几乎毫不犹豫别无选择地飞射而去。是父辈和自己多少年的铺垫，拉开了那张满满的弓。那一刻，我没有想很多。我只想到我终于可以自由，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看一看世界，对我比一切的一切都重要。我对自己说，我要走遍世界走遍已经读过的每一个国家和城镇。心里明知这不可能，我还是固执而不能放弃梦想——我想我会继续这梦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辛劳和谋生自不待言，而旅行、阅读、写作，这样完美的循环似乎终于启动。每次上路，我在背包里塞进几本书，通常除了导游手册，还有那里的历史、前人的游记。有时候一路走能一路读上一堆；有时候带的书顾不上打开又原封不动背回。我问自己：这不是你很久很久以前期待的理想状态吗？我却忽然变得迟疑，我不知道，至少不那么确定。我只知道，任何一种状态中都有陷阱。

我们的自由渴望和创造力，局部来自于一种特殊的生活经历，我也看到，“经历”在这个特殊群体中也在越来越成为一种负担。周围的同龄人出现几种可以归类的趋同倾向：趣味、视角、观念、判断、兴奋点，以及理解方法、表述方式。一代人有自己的历史特征，也有它独特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有他们的局限、有等候他们的同一口历史陷阱。

同样，进入一种模式，就可能进入一条轨道，旅行可能为了写作而规划，阅读可能变为数据查询而失去乐趣，写作可能成为一个必须的工作，生活和你的初衷就在不知不觉中变味。你向着一个方向走了很多年，山重水复，什么障碍都越过，却可能在平原轻轻易易就迷失自己。于是，我在想象中回到那个原点。

在走过北美、走过巴黎、走过西班牙、走过意大利，又回到亚洲走过印度之后，我试着寻找那个站在原点的自己。曾有那一天，这游历世界的旅途在想象中都绝不可能发生。那时我们的命运被动而没有选择，但却渴望读书，渴望见到世界。心在胸膛怦怦跳动，健康而年轻。

那一天，黑龙江下着冰排，我们站在一个开端，内心没有负担。我们站在不可逾越的边境线，瞭望外面的世界。一无所有，却内心平衡，对世界充满好奇。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苏珊·桑塔格：对旅行的反思


苏珊桑塔格：美国著名作家和评论家

“

旅行的普及催生了旅行写作的新类型---悲观失望的文学，并从此与理想主义文学双峰对峙。欧洲人游历美国，希望在那儿过上新的、简单的生活；有教养的美国人返回欧洲，认识旧大陆的文明的源泉---通常两者都大失所望。

”

有关异域的游记总是把“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人们对这种对立关系的看法大同小异。古典和中世纪的旅行文学大多讲述“我们文明、他们野蛮”——“我们文明，他们令人生厌”是最有代表的一种。外国的东西都是古怪的，通常表现在生理上的异常。长久以来一直有对怪人、“肩下牛头的化外异民①”（奥赛罗赢得苔丝狄蒙娜芳心的故事中出现了这种描写）、独眼巨人、食人族以及诸如此类的奇人怪物的描写，这让我们看到过去的人们太轻信了。但是，这种轻信也是有限度的。这些基督教文化更容易接受妖魔鬼怪的存在，但对完美或接近完美的东西的存在却不那么容易接受。因此，连续几个世纪以来，世界地图上都有一些奇怪王国出现，与此同时，可视为楷模的种族大多出现存有关乌托邦的游记里；也就是没有任何地方存在这样的民族

直到十八世纪，有关更加离奇的地方的作品才大量出现：关于理想社会的文学，描写据说确实存在的地方，毋庸置疑，十八世纪的纪实文学和小说与以第一人称叙述的非虚构作品——小说的重要模式——是紧密相联的。那是旅行故事和游记形式的小说的全盛时期；《格利佛游记》是虚构的海上航行中最精彩的，它融合了对与我们迥然不同的地方的两种主要幻想。故事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对一系列怪异种族的造访，疲惫的主人公最终来到一个理想国：这是“我们文明，他们野蛮”传统的黄金时期，这一传统很快便繁荣起来。

前现代的旅行文学理所当然地认为旅行者所处的社会与被他们视为畸形、野蛮、落后和怪异的社会截然不同。以旅行者——职业（或业余）观察者——的口吻讲述的故事一定会为文明社会辩护；没有一个前现代的旅行者会认为自己是野蛮人。当文明一词变为一个评论性的、不言自明的概念时——也就是说不清谁文明谁不文明时——现代旅行文学产生了。



在启蒙哲学家（现代意义上最早的知识分子）看来，旅行是一种说教式的幻想。为了说明自身的邪恶，他们总是提到欧洲以外的遥远的社会，在他们的描写中，这些社会更“自然”或者更“理性”。航海者在遥远的地方所经历的奇闻轶事直到十八世纪晚期还广为流传——例如，巴塔哥尼亚②的九英尺高巨人——但怪异感渐渐与道德产生了关联。“我们”变得道德败坏。描写去奇域旅行的文学大量涌现，对那儿的美德的描写揭示了与欧洲之间发人深省的反差。这种旅行走出文明社会——也就是现在——走向更美好的礼会：过去或未来。

过去，许多人到美洲进行这样的旅行，有真实的，也有杜撰的。“起初，”约翰·洛克说，“整个世界都是美洲。”克雷夫科尔③和夏多布里昂在新大陆发现了比文明更好的东西，因为它们未受到文明的侵蚀：健康、活力、道德完善、让人喜欢的天真和直率。然而，幻想烟消云散之后，反文学(counter-literature)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十九世纪中期尖刻的英国旅行者如法尼·特罗洛普和狄更斯④发现文明并不文明，简直粗俗不堪；哈利特·马蒂诺⑤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感受到了风起云涌的废奴主义和女权主义，她更喜欢“我们”。许多现代对异域风情的评价都是对过去的反驳。十八世纪的土耳其人被认为是模范的种族之一，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无畏的马蒂诺造访“土耳其”的两处后宫，她说后宫里的人是她所见过的伤害最深的、最抑郁的、最堕落的。

在这些对旅行的感受中——异国他乡不是被说成世外桃源，就是说成蛮荒之国——希望与幻灭总是交替出现。尽管如此，某些国家（总是令人不解地在人们心目中有固定的形象）比其他国家更容易被理想化。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以来，它一直是个神秘王国；在十八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在中国这个理性之国，没有战争、道德沦丧、愚昧无知和迷信，也没有大规模的疾病。同样，美国尽管遭人诋毁，它仍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乐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人们对俄国的风俗习惯和所作所为深感痛心。自从俄国第一代沙皇“恐怖伊凡⑥”引起欧洲的兴趣之后，有关声名狼藉的俄国社会的报道已经成为西方旅行文学这一大河中富有生命力的支流。为数不多而又让人印象深刻的反报道(counter-reports) ——指二十世纪三十代到五十年代（确切地说是大恐怖叫代）外来造访者记录的苏联在自由和公正方面达到的史无前例的高度——强化了这一传统。

我们无法想像人们读了屈斯蒂纳侯爵 1839 年游历俄国时发现的野蛮和专制后会感到幻想彻底破灭，但可以想像人们看了西蒙·莱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描写后会彻底绝望。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倾向把中国说成极乐的天堂，而把俄国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倾向至今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有些国家一直是人们幻想的对象。



启蒙哲学家不仅把理想的品德赋予高尚的野蛮人——伏尔泰和卢梭笔下的休伦湖人⑦，狄德罗笔下年迈而睿智的塔希提岛⑧人，还赋予当时欧洲以外的人（“东方人”），如土耳兑人、波斯人和中国人。此后几代作家的幻想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否定的。在浪漫主义诗人看来，惟一的“理想的”文明——希腊文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施行本身曾是一种反常的活动。浪漫主义者认为从根本上说自我就是一个旅行者——一个不断追寻、无家可归的自我，他归属于一个根本就不存在、或已经不复存在的地方；那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反差。他们认为这种追寻是没有止境的，因此目的地是不确定的。旅行从此成为现代意识和现代世界观的先决条件——是对心中的渴望和绝望的宣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潜在意义上的旅行者。

旅行的普及催生了旅行写作的新类型——悲观失望的文学，并从此与理想主义文学双峰对峙。欧洲人游历美国，希望在那儿过上新的简单的生活；有救养的美国人返回欧洲，认识旧大陆的文明的源泉——通常两者都大失所望。自十九世纪早期以来，欧洲文学界弥漫着对欧洲的厌恶，越来越多的旅行者纷纷涌向新奇的、西方以外的地方，这与早期的老一套的认识如出一辙：在更简单的社会里有纯洁的信仰和原始的自然，人们不如道不满（和它的文明）是什么。但是天堂总是难觅的。现代游记里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现代社会造成的破坏和往日的逝去——这是对个社会每况愈下的写照。十九世纪的旅行者注意到经济利益使像南太平洋地区这样的地方祥和安宁的生活受到影响；尽管旅行者做梦也不敢想像自己能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希望当地人能永远健康、性感，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话，不要去享受现代生活中的舒适。

让现代人萌发旅行念头的另一典型因素：一个国家值得一看——值得一写——因为它曾爆发过革命，最脚踏实地的、最有思想的旅行作家阿莱克斯·德·托克维尔⑨在美国目睹了一场没过多久就政变了整个政洲的激进运动，使过去的一切土崩瓦解。正是为了考察革命和民主，托克维尔才到美国游历的。去考察一场声称为了实现理想的革命如何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旅行一直是现代旅行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在二十世纪，有着类似目标的旅行者走向了爆发革命的地方，寻找理想中的家园，寻找普遍意义上的革命。不少关于从“西方”到其共产主义国家旅行的文学是旧体裁的一种新变体，在这种旧的旅行文学中，来自堕落的、老于世故的欧洲的旅行者赞美“新世界”健康向上的活力——现在他们把自己称为“新人”。

在对理想目的地的构想中，“革命的”取代了“原始的”，但还是保留了许多被认为是“原始”的特质。“我已经看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确实是灵丹妙药。⑩”这是二十世纪 30 年代早期林肯·史蒂芬斯结束了苏联之行后说的非常有名的一句话，那时也许是把共产主



义与现代化等同起来这一观点最流行的时候。但是当苏联模式受到质疑，当或多或少受到围攻的农业社会只得选择革命时，旅行者似乎真正感受到：我已经看到了过去，它正在……运动。

去那些赤贫的国家旅行就如同时光倒流：离开生活富足，充满怀疑的文明社会，去寻找早期的那种单纯、虔诚和艰苦的生活。芭芭拉·沃顿在描写她1973年的中国之行时说："对任何一个来自错综复杂、令人窒息世界的人来说，中国人简单的生活方式都让他心驰神往。"她的感受并不是纯粹的幻想。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在农业国家里爆发，而且相对于为实现某种现代化付出的所有努力而言，它也竭力保护现代化以前的很多东西，如传统的家庭生活和文学的中心地位：它还消解或者至少延缓---部分是因为难以对付的经济衰退---以富足、宽容的价值观和"放纵的"大众文化特征的消费社会的冲击。那些不幸的中欧国家（现在变成了"东方"）虽然在俄国通知期间都不落后，现在都毫不例外地被共产主义延缓了进入现代的脚步，比起西欧它们明显带有二战以前的痕迹。外国游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点才对它们情有独钟的。

隔阂感是几乎所有现代反思性旅行文学中最重要的题材。旅行可以印证对这个世界怀疑的、美好的或者推测性的看法。旅行抑或就是尝试消除隔阂感，旅行者在途中赞扬遥远的社会所具有但自己的社会所缺少的美德或者自由。随着去欧洲以外的地区旅行的机会越来越多，另一种旅行越来越普及。富裕的旅行者摆脱了中产阶级的束缚，外出度假，他们尽情尝试"新奇"的东西，或纵情地寻花问柳。福楼拜在马克西姆·杜·坎普的陪同下于1850年到1851年的埃及之行就是十九世纪一个著名的例子。（二十世纪，一些同性恋作家是去殖民地和前殖民地找乐子的高手）在去爆发革命的地方的旅途中，另一种独特的东西是显而易见的。在共产主义国家，有些东西现在被认为是过时的，比如一本正经的性观点。性放荡现在与堕落而不是原始相关联。革命代表着美德的王国，游客一直相信革命社会里的行为因此而改变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许多西方的游客都深信接待他们的中国主人说的话：中国夜不闭户、没有同性恋、也没有婚前性行为。

尽管寻欢作乐的旅行与去在革命中挣扎的贫穷国家旅行时截然不同的---后者是高尚而富于启发性的，但后一种旅行同样会产生居高临下、事不关己的感受。苦难沉重的当地人却有高度的革命意识，这对富有同情心的旅行者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例如，狂热的中国共产主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减退时，据说初到中国的旅行者因为错过了中国最纯真、最虔诚、最不受消费主义侵蚀的时代而相互劝慰。

许多早期去革命爆发地的旅行者就如同原来文学里的旅行者一样，去一个奇异的国度就是为了回来后写有关它的游记。去这些国家的旅行者都意识到自己跨越了可怕的障碍。（跨



过了长城，把铁幕抛在背后）他们要写的是一个奇异的国度。但他们真正描写的是他们的行程，也就是为贵客制定的满满的。活动计划。事实上，这些书像《在中国的每一天》----西蒙·德·波伏娃对 1955 年中国之行的直率的记录---一样是对旅行的记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随着去中国旅行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不禁发现，旅行者描写的旅程简直一模一样：杭州附近的同一家产茶公社、上海的同一家自行车厂，北京的同一个“里弄居委会”---尽管这么雷同，许多人还是热情不减地往那儿跑，写的书几乎千篇一律。

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都孤立无援，遮遮掩掩，神神秘秘，接待外国游客时有严格的程序，每一步都精心设计，同时千方百计地讨好他们，送他们返程时还会赠送精美的小装饰物和书籍让他们带到外面的世界去。就像以最现代的方式到任何遥远的地方去旅行冒险一样，旅行者到爆发革命的地方旅行时体会不到危险的，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神秘、危险、不快，与世隔绝，这些事去遥远的地方旅行的传统成分。即使最独立的、独行的观察者很可能会聘请当地人做导游，观察者在部分行程中主要通过导游 与当地人交流----就像V·S·奈保尔的《在信仰者中间》里所写的一样，该书写的是他到因革命引起剧烈动荡的伊斯兰国家的旅行。但独行的观察者对当地朋友的态度不会轻信，到发生共产主义的地方集体旅行时为了达到另一种结果。这些旅行是有旅游部门的官员组织的，目的是要使这个国家被人理解。到共产主义国家去的很多游客相信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的向往和需求与我们根本不同，但其实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认为他们的制度和习俗与我们差不多，但事实上两者截然不同。

过去，去新世界的海上旅行常常是危险的、举步维艰的---如此艰难，以至于许多旅行者都望而却步。许多游记的作者都“闭门造车”，剽窃早期的游记。最终神奇之旅都成了泛泛之作，拼凑的痕迹越来越明显，原来的毛线故事因此而变得过时了，过去人们所写的旅行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的。在现代，有意欺骗读者的游记比原来少的多，在更多的游记中作者被欺骗了，人们发现其游记中谬误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毕竟，十八世纪末没有一个纳齐兹部族的女人会跑到巴黎解释说夏多布里昂 1791 年兴致勃勃的（有一部分是凭空想象的）美国之行中忽略了哪些东西，曲解了哪些东西。但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亨利·华莱士，欧文·拉铁摩尔弄干净访问过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集中营，并说它堪称工作场所的典范（兼有哈德逊湾公司和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特征），而一位曾在此做苦役十多年的女因犯几年后站出来，写下了囚犯们对来访者的愤怒与蔑视。

十九世纪的异乡游记很少提及陪伴冒险旅行者的仆人，而仆人通常不止一个。而现代去革命爆发地旅行的人则很少提及他所在的集体。描写共产主义国家之旅的人通常都是应邀前往的。这通常意味着他只是游览团中的一员——这是教育之旅，由东道国发起并支付一切



费用。就像所有的团体旅行一样，游客认识不了几个同行的人，甚至一个也不认识。这个团体可能小到只有三个人（如我 1968 年 4 月越北之行），或者五个人（如我 1980 年 4 川的波兰之行），或者八人(如 1981 年我的中国之行)。学生们大都四十人一个团；知名人物的旅行团很少会超过五到六人：尊贵的重要人物一般都被邀请带上配偶或随从一起旅行。如果是第一次去共产主义国家，他们都会惊奇地发现旅行团——不管多小、多特别——都被称作“代表团”。你可能会抗议：我们并不代表我们国家的任何人，每个成员只代表自己，但是面带微笑的主人依然会称“你们代表团”。

通常，进入东道国的前一天，所有参加旅行的人在进入东道国的途中在宾馆集中，他们被告如代表团在旅行时的注意事项，他们要选出一名“主席”（有时还有“副主席”）负责答谢东道主的官方讲话，并在宴会中坐在主桌带头敬酒。从存丰桌带头敬酒。（有此代表团让成员轮流担当这一角色，以分享隆重的礼遇和愉悦）不论你走到哪里——他们迎接你的火车站、工厂、学校或者作家协会——你的代表团见到的都是他们组织的代表。

任何请柬上都有邀请的东道主——组织者；而且每一次旅行都有一个计划。他们带旅行者去博物馆、模范幼儿园，某位著名作家或者诗人的故里；工厂和公社的负责人欢迎旅行者，用茶水招待，提供虚假的数据；一顿接一顿地享用盛宴，利用空余时间光顾为外宾开设的酒店；旅行者忙于应付紧张的行程，只能在相互之间或与接触到的自限的当地人（也就是为代表团指定的亲切热情的导游）说说话，他们的结论就是建立在与这些当地人的交流

的基础之上。这些官方的陪同人员——除几个负责人以外，大多是年轻人，他们热心，急于表现（他们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与外国人接触这一人人眼热、激动人心的机会），小心翼翼（他们知道一个小错误或者疏忽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生怕有什么闪失。游客在他们的陪同下总感到很忙碌，但他们更忙。在午饭后的休息时间里，他们要忙着购票和打点住宿；深夜，他们还要写有关当天活动和参观者反应的报告，计划接下来的活动。游客通常都是贪心不足的，而到共产主义国家的旅行团认为应该是以他们为中心的，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到共产主义国家的游客只要说一声想参加日程上没有安排的远足和娱乐，陪同人员就会给幕后指挥的人打电话，像变戏法似的变出需要的票子、现场导游和豪华汽车。

从教育旅行的定义来看，它是一般人无法享受的旅行——买好来回票的旅行。为接受教育而去国外旅行的典型要数十八世纪的“大旅行”(rand Tour, 指从前英国贵族子弟的教育中不可缺少的欧洲大陆观光旅行)了。年轻的贵族带上一个通常出身卑微、薪水很低的家庭教师，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去不同的地方，欣赏异曲同工的艺术瑰宝。尽管这种横穿欧洲大陆的休闲旅行通常不过是纨绔子弟的游乐而已，但其教育意义可否认的，经历过欧洲



“大旅行”的回到家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被外国的东西所玷污，但至少他体会到文明有很多模式——这也许是真正文明和礼仪的开始，

为游客提供的去共产主义国家的“大旅行”是经过设计的，以确保他们不会遇到任何有损国家形象的东西。“大旅行”或田野调查的先决条件，旅游者在智力和文化上的距离，这些都被团队旅游中豪华舒适的安排进一步强化。旅行者看到的爆发革命的地方犹如迪士尼乐园，围绕的主题是国家的进步和革命带来的好处，而这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文化上的简单表演来展示的。游客们被带到那儿，艳羡不已。但是，来自富裕国家的旅行者，包括自认为是左派的人，很少能够对这种作秀作出评价。如果他们是第一次去共产主义国家，他们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去卡车厂，养殖场或是造纸厂。大多数游客对北产主义、参观的国家（他们常常

连地图都没有看过，不了解这个国家历史上最基本的情况）、农民的生活和主要工业流程一无所知。

所谓一起旅打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明白，都不是代表团旅行最好的参与者。事实上，共产主义国家中旅行部门的官员们已经渐渐不再信任西方的左翼分子，而且——这在理查德·尼克松最喜爱的国外专用度假村和罗纳德·里根的“所谓的共产主义中国”里再清楚不过了——他们希望游客被接待时不受激进情绪的影响：董事长比左派的历史学讲师更受欢迎。这样的游客离开时对这个国家的印象比来之前好得多，部分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国家里有这么多友善的、有吸引力的人，异国情调的大街上满是“和 我们一样的”人。

他们来之前都想像了些什么呢？

① 见《奥赛罗》第一幕第三场，朱生豪译本。

② 南美一地区。

③ Crevecoeur（1735-1813），法裔美国作家、博物学者，出版文集《一个美国农民的信》，介绍美国当时生活情况和存在问题。

④ 1842 年，狄更新在波士顿登陆，开始为期四个半月的美国之旅。

⑤ Martneau，Harnet(1 802-1876). 英国女作家，著有关于社会、经济、历史等方面作品多种，主要有《政治经济学解说》等。



⑥ 俄国第代沙皇的绰号．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之子。1147 年加冕亲政，称沙皇．他对内实行政治、经济、司法和军事改革，对外积极扩张。他加强中央集权，建立“沙皇特辖制”和特辖军，残酷镇压贵族反对派和人民群众。

⑦ 北美易洛魁印第安人的一支。

⑧ 位于南太平洋，是法属波利尼西亚的经济活动中心。

⑨ Tocqueville ，Alexis de（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等。

⑩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不少美国人将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上。

（本文节选于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一书）

【回到目录】



├结┤

阿兰•德波顿：《旅行的艺术》：习惯





阿兰•德波顿：英国作家，毕业于剑桥大学，现居伦敦

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我们已经居住了 10 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地方,还能发现什么新的东西。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一切，因而对其视若无睹。塞维尔・德・梅伊斯特试图将我们从被动状态中唤醒。在他关于室内旅行的第二部作品《卧室夜游》中，他走到窗前，抬头凝望夜空。天空的美景让他感触良多，为什么以前不懂得欣赏这样的寻常景色现今能从这宏伟的景致中感到快乐的人真是太少了！天空对于困倦的人们来说毫无意义！对于那些出来散步或是挤出剧场的人群来说，抬头望一会儿，赞叹在他们头顶闪烁的星群，会让他们损失什么呢？”一般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前从未这样做过。大家都习惯了，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很无聊——于是，生活正如他们所预期的一样无趣。

”

1、我从巴巴多斯回到伦敦，发现这座城市依然固执地拒绝改变。我已看到蔚蓝的天空和巨大的海葵；我曾经睡在一间以酒椰纤维做屋顶的湖边度假屋，吃下一条大鱼；我曾和小海龟一同游泳；在椰子树的树阴下读书。 但是故乡却没有给我很好的印象。它仍然在下雨。



公园满是积水，天空仍然是阴暗的。当我们心情很好，而又看到阳光明媚时，我们会很容易将产生于我们自身之内的情绪归因于周围环境所给予的影响。然而在我返回的时候，伦敦的外表却提醒我，世界对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任何事件的冷漠。返回伦敦使我感到绝望。我注定要在这个可怕的城市生活下去。在这个地球，恐怕没有几个地方比这里更糟了。

2、人类不快乐的惟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他的房间里。

——帕斯卡尔《沉思录》，第 136 页

3、从 1799 年到 1804 年，亚历山大·冯·洪堡尝试了一次 环绕南美洲的旅行,后来将描写他的所见的文章命名为《新大陆赤道地区之旅》。

在洪堡开始旅行的 9 年前，也就是 1790 年的春天，一个 27 岁的法国人，塞维尔·德·梅伊斯特，进行了一次环绕他 卧室的旅行，后来将描写他的所见的文章命名为《我的卧室之旅》。这次的经历让他感到非常满足，在 1798 年，德·梅伊斯特进行了第二次旅行。这一次他彻夜在房间里游荡，并且冒险地走到了远至窗台的位置，后来将他的描述命名为《卧室夜游》。

《新大陆赤道地区之旅》，和《我的卧室之旅》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旅行方式。第一种旅行要求有 10 匹骡子，30 件行李，4 个翻译员，一只经纬仪，一个六分仪，两架望远镜，一台博得经纬仪，一只气压计，一只指南针，一只湿度计，西班牙国王写的介绍信和一把枪。第二种旅行，则需要一套粉红色和蓝色相间的睡衣。

塞维尔·德·梅伊斯特 1763 年出生于法国阿尔卑斯山脚下风景如画的小镇仓伯利。他天性热情而浪漫，喜欢读书，尤其是蒙田、帕斯卡尔和卢梭的作品；喜欢绘画，尤其是画丹麦和法国国内的风景。23 岁的时候，德?梅伊斯特开 始迷上航空。在那之前 3 年，艾蒂安·蒙戈尔菲埃已经因为制作了一只在凡尔赛宫上空飞翔 8 分钟的热气球而为世人所知，热气球上的乘客包括一只名叫“Momandel”(意即“爬上天空”）的绵羊，一只鸭子和一只公鸡。德·梅伊斯特和一个朋友用纸和金属线制作了一对翅膀,计划飞往美洲。他们没有成功。两年以后，德·梅伊斯特登上热气球，在坠入一片松树林之前，在仓伯利的上空飘浮了一会儿。

后来，到了 1790 年，德·梅伊斯特住在杜林一幢公寓楼顶层的一间素朴的房间里，在那里他率先开始了一种使他成名的旅行模式：室内旅行。

在介绍《我的卧室之旅》这本书时，德·梅伊斯特的哥哥,政治理论家约瑟夫·德·梅伊斯特,强调塞维尔的目的并不在于讽刺过去那些伟大旅行家——麦哲伦、杜雷克、安森和库克



——英雄般的经历。麦哲伦发现了一条西行的路线，通往南美洲南端的斯拜斯群岛；杜雷克作了环球航行；安森绘制了精确的菲律宾群岛航海图,而库克证实了一个南方大陆的存在。“他们毫无疑问都很杰出，”约瑟夫写道。但他弟弟发现了一种更实际的旅行之道，让那些像他们一样缺乏勇气或财力不足的人也能一圆旅行梦。

“在我之前，有数百万人不敢去旅行,还有一些人不能去旅行，而更多的人甚至想都没有想过去旅行。现在，他们都可以模仿我。”塞维尔在准备他的旅行时解释说。“即使最懒惰的人在出发寻找快乐之前也将不会有任何借口犹豫不决，因为这样做既不费钱也不费力。”他尤其向穷人和那些害怕风暴、强盗和险峻悬崖的人推荐室内旅行。

4、不幸的是，德·梅伊斯特开拓性的旅行方式，就像他的飞行器，并没有更深更远的影响。故事的开始部分很不错。德·梅伊斯特锁上门，换上他的粉红色和蓝色相间的睡衣裤。没有了行李的累赘，他径直走向沙发，这是房间里最大的家具。他的旅行已经将他从惯常的无精打采中唤醒，他以旅人之眼注视沙发，并重新发现了它的一些特质。他赞叹它高雅的支脚，回想起他偎依在靠垫上的愉快时光，幻想着他一生中的爱情和事业上的晋升。他从沙发的角度打量自己的床，又一次从一名旅行者(观看事物）的角度出发，学会了欣赏这件复杂的家具。他为自己在床上度过的香甜夜晚感到感激，而他的床单和睡衣几乎总是搭配得很好，这也让他感到骄傲。“我建议每一个人如果可以的话，让他自己换上粉红的睡衣和白 色的床单他写道，因为这些色调能给容易惊醒的人带来宁静和愉悦的幻想。

但是，德·梅伊斯特接下来的描述则有可能被指为偏离了主旨。他开始陷人冗长的题外话，他开始谈他的狗，罗西尼：他的爱人，珍尼和他忠实的仆人，约安那提。对室内旅行的独特之处深感兴趣的读者这时可能会把书合上，并觉得有点被背叛的感觉。

然而，德·梅伊斯特的作品来源于一种深厚而具有暗示性的洞察力：即我们从旅行中获取的乐趣或许更多地取决于我们旅行时的心境，而不是我们旅行的目的地本身。如果我们可以将一种游山玩水的心境带入我们自己的居所，那么我们或许会发现，这些地方的有趣程度不亚于洪堡的南美之旅中所经过的高山和蝴蝶漫舞的丛林。

那么，什么是旅行的心境？感受力或许是它最主要的特征。我们怀着谦卑的态度接近新的地方。对于什么是有趣的东西，我们不带任何成见。我们也许会让当地人感到不解。因为我们在马路上或狭窄的街道上,欣赏那些他们 认为有些奇怪的小细节。我们冒着被车辆撞倒的危险是因为我们为一座政府建筑的屋顶或是刻在墙上的题字所吸引。我们发觉一间超市或是理发店不同寻常地迷人。我们用很 长的时间思索着一份菜单的设计或是晚间新闻里主持人的服装。我们敏锐地感觉到被覆盖于现今之下的层层历史， 并记笔记和拍照。另一



方面，家，使我们在期待中更能觉到安定感。由于在那里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确信这附近不再会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我们已经居住了 10 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地方,还能发现什么新的东西。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一切，因而对其视若无睹。

德·梅伊斯特试图将我们从被动状态中唤醒。在他关于室内旅行的第二部作品《卧室夜游》中，他走到窗前，抬头凝望夜空。天空的美景让他感触良多，为什么以前不懂得欣赏这样的寻常景色现今能从这宏伟的景致中感到快乐的人真是太少了！天空对于困倦的人们来说毫无意义！对于那些出来散步或是挤出剧场的人群来说，抬头望一会儿，赞叹在他们头顶闪烁的星群，会让他们损失什么呢？”一般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前从未这样做过。大家都习惯了，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很无聊——于是，生活正如他们所预期的一样无趣。

我试图绕着我的卧室旅行,但是它这么小，几乎连一张床也容纳不下，以至于我得出结论，如果德·梅伊斯特的理论应用于我居住的小区，或许会更有价值。

因此,在 3 月间一个晴朗的下午，大约 3 点左右，在我从巴巴多斯回家几周后，我开始以德·梅伊斯特式的旅行方 式环游哈默史密斯。在正午外出，而脑子里没有特定的目的，使我感到有些奇怪。一个妇女和两个金发小孩正沿着主干道往前走，道路两旁是各式各样的商店和饭馆。一辆双层巴士停在一座小公园的对面搭载乘客。一块巨大的广告板上刷着肉汁的广告。我几乎每天都行走在这条通往地 铁站的道路上,并且只习惯于把它想成是到达我的目的地 的必经之途。可以帮助我实现目标的信息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无法吸引我的是那些被判断为不相干的事物。于是我留心观察人行道上行人的数量，因为他们可能挡住我的去路，反之我无视于他们的脸和表情，就如同无视于建筑物的形状或是商店里的活动一样。

情形也并不总是这样。刚搬到这一地区的时候，我关注的事物并不只限于这几点上。那时候，我还不会一心只想赶快到我要去的地方，而对周围场景视而不见。

刚进人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的敏感性会引领我们注意很多东西，等到确认这个地方对我们而言有何功能之后，我们注意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比方说，在一条街上或许有 4000 种事物可以看到和想到，我们最后积极关注的却只有其中的 3 到 4 件：在我们所走的路上的行人的数量、 交通车辆的数量和下雨的可能性。我们最初对一辆公共汽车也许会从审美或机械构成的角度看待它，或许它会引发我们对城市内社区的思考，但久而久之，它在我们眼中变成了可以移动的盒子，它可以快速地把我们送到目的地,而路过的区域仿佛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跟目的地无关。车窗外,一切都归于黑暗，什么都无法进入我们的视野。



我已经为街道限定了一系列可被称为有趣的东西的范 围，其中没有金发的小孩、肉汁广告、铺就人行道的石子、店 面的色调以及店员和领养老金的人们的表情。我只关注于自己的首要目标，而不会去考虑公园的布局，也不会注意到同一条街上竟然杂陈着乔治亚式、维多利亚式和爱德华式的建筑。我行走在这条道路上，不会感受到任何美的吸引，不会产生任何联想，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感到惊异或感动, 我也无从萌发哲思。而代之,只有一个强烈的呼唤，那就 尽可能快地到达地铁站。

然而，追随着德·梅伊斯特，我尝试颠倒习惯的过程，并在抵达目的地前，尝试分离我周围的环境和我以往为这些地方所设定的用途。我强迫自己遵循一种特殊的精神命令:环顾我的四周，仿佛我从前从未来过这里。慢慢地，我的旅行开始有了收获。

我告诉自己，这里的每件东西都可能是有趣的，眼前的事物于是开始显现出潜在的价值。在原有的看法中，一长排商店不过是一片没有特色的红色建筑，但细看之下，我对这种建筑风格产生了认同。一家花店的两旁有乔治亚风格的柱子，肉店的顶部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哥特式风格的怪兽状喷水口。饭馆里满是用餐的人，而不是各种只会动的形状。在一座装有玻璃门的办公楼里,我注意到一些人在一楼的会议室里做着手势。有人在使用投影仪，投影图上显出一张饼状图。与此同时，就在办公室对面的道路，一个男人正在为人行道铺设新的水泥板，并仔细地固定它们的边角。我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这回我没有过多地考虑自己的事情，而是尝试着富有想象力地把自己同其他乘客联系起来。我能听到我前面一排的乘客交谈。在某个办公室 里的某个人——很显然级别相当高的一个人,不曾尝试理解他人。这些级别相当高的人们抱怨别人效率多么地低， 但从来不反省他们做了些什么使问题更加严重。我想到了在同一座城市同一时间里处于不同生活水平上的人的多样性。我想到人们相类似的抱怨，他们抱怨别人自私，有眼无珠，但实质上，我们对别人的抱怨也就是别人对我们的抱怨。

周遭的一切不仅包括人和风格鲜明的建筑，而且开始聚集理念。我思考涌入这个区域的新财富。我试图判断出我为什么如此喜欢铁路的拱门以及为什么要修建切过地平行线的高速公路。

独自旅行似乎有一个优点。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通常在极大程度上受到我们周围人们的影响，我们调和自己的求知欲去满足别人的期待。他们或许已认定我们是怎样的人，因此我们不得不有意识地隐藏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我没想到你是那种对公路路桥感兴趣的人,”他们也许会 以一种让你不自在的口吻说出他们的看法。被一个同伴近距离地观察会阻止我们观察别人，我们忙于调整自己以满足同伴的疑问和评价，我们不得不让自己看上去更正常,这样一来便影响了我们的求知欲。但是独自一人行走在哈默史密斯的正午，我却没有这样



的顾虑。我可以无拘无束地做出些奇怪的举动。我描下了一家五金店的窗户的草图，并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公路路桥。

6、德·梅伊斯特不仅仅是一个室内旅行家。他也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伟大旅行家。他游览过意大利和俄罗斯，与皇家军队一同在阿尔卑斯山度过了一个冬天，并且在高加索与俄军交战。

在 1801 年一篇写于南美洲的自传体笔记中，亚历山大·冯·洪堡写到了他旅行的动机我被一种不确定的渴望所激励，这种渴望就是从一种令人厌倦的日常生活转向一个奇妙的世界。”正是这种对立的关系，即“令人厌倦的曰常生活”与“奇妙的世界”相对的关系引起了德·梅伊斯特的兴趣，他乐于为这两个世界重新划出精妙的界限。他一定不会告诉洪堡,南美洲是乏味的，他仅仅会催促他去思考，他的故乡柏林或许也能提供某些东西。80 年以后，尼采读了德·梅伊斯特的著作并大加赞赏（他自己也是一个老在斗室打转的人），他曾发表如下感想：

有些人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经验，使自己成为沃土，在这片沃土上每年能结出三次果实， 而其他一些人（为数众多）则只会逐命运之流，逐时代和国家变幻之流,就像一个软木塞一样在上面漂来漂去。当我们观察到这一切后，我们会把人分为两类：一种人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另一种人则是化神奇为腐朽，绝大部分人是后者，前者则为数寥寥。

我们遇见过穿越沙漠的人，在冰上飘泊或在丛林里穿越的人，然而在他们的灵魂里，我们无法找寻到他们所见的痕迹。穿着粉红色和蓝色相间的睡衣，心满意足地待在自己房间里的塞维尔·德·梅伊斯特正在悄悄提醒我们，让我们在前往远方之前,先关注一下我们已经看到的东西。

（本文节选于阿兰·德波顿的《旅行的艺术》一书）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刘垚，王陶陶，常仁豪

设计：池春荣，季文仪

校订：施钰涵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